

「家鄉」作為「田野」： 再思本土田野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

陳雲龍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研究所

「回歸家鄉」已經成為20世紀70-80年代以來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鮮明轉向，其與異鄉研究的方法論爭議也延續至今。本文以「中國」為起點梳理這段學術史，指出家鄉學者在批評異鄉研究的不足並宣稱自己的近距離優勢時，不能將其抽象、簡化並沉溺於自我優勢，以此豁免對自身侷限的反思與超越。筆者結合自己家鄉浙北鄉村的田野經歷，對研究者與當地人的角色身份、相互關係、個人特徵與交往過程及相關問題重新進行定位和反思，發現家鄉研究未必有其學術群體聲稱的那麼多本地優勢，也未必有一些異鄉學者批評的那麼多內部侷限。由於和當地人的文化距離不同，兩者的遭遇既有相似，也有不同，各有利弊。核心處境差異是家鄉學者面臨學術與生活的高度融合，及其引發、放大並複雜化的各種田野與學術問題。

從文化特殊性角度說，在浙北鄉村做田野調查，家鄉學者要更充分考慮當地／中國／華人／漢人社會之文化因素的深度捲入對田野和生活的雙重獲益或損害；擴展到中國學術—文化場域及其與世界學術—文化體系的關係看，家鄉／本土學者以文化近距離優勢與本土方法論立場貶低或排斥異鄉研究，既容易強化雙方的二元對立，導致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和自我殖民等學術—政治問題趁虛而入，也違背田野工作、論著書寫和學術交流的根本意圖，還可能成為一些家鄉／本土學者在本地學術—文化場域中攫取學術名

投稿日期：2021年7月8日 接受出刊日期：2023年6月14日

*謝辭：本文是中國大陸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家庭主義脈絡下的代際關係實踐與孝道變遷研究》（22ASH010）的部分成果。初稿源自筆者2021年撰寫的博士論文〈儒家角色情感倫理與浙北鄉村人情生活的實踐與嬗變〉中有關家鄉研究的田野方法反思部分。感謝三位審查人的批評、意見和參考，使本文品質有了顯著提升。

利、鞏固私人圈子的知識工具。總之，家鄉／本土研究的方法論探討指向一條對「自我」和「我們」的、徹底的認識、反思與超越之路。

關鍵詞：家鄉／本土研究，田野工作，文化距離，文化身份，自我反思

從人類學與社會學家對「田野」包羅萬象的理解和解釋來看，它包含兩層要義：一是研究者依照研究對象所屬文化體系定義的、具有一定時空範圍的調查地點，是較為明確的地方、地點或場所的位置（集合），具有調查範圍或經驗領域的意義，理想原型是Malinowski式的「田野」；一是研究者提煉「當地人」的文化類型的實際依託，比如Clifford Geertz提出的「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具有研究對象或文化體系的意義。兩層內涵既使「田野」與「地方」、「文化」的概念相互指涉，也將自身的經驗和理論意義統一起來，同時保留兩者的差異和張力。但人類學真正的研究對象是「人（群）」，特別是與本文化差異明顯之異文化中的人。所以，無論是「地方」還是「文化」意義上的「田野」，在理解和界定时最終都要根據人群的活動範圍和問題指向靈活定位，而不是機械地鎖定三者的關係。

從第一層涵義來看，20世紀70、80年代以來，「田野」的經驗內涵日趨豐富，在全球流動與網絡社會中不斷展開。作為「地方」的「田野」不再是一個或若干靜態「地點」，而是一系列開放、關聯、流動的人群活動重組和再生產的起點與網絡。社會學與人類學的傳統邊界因此日趨模糊。從第二層涵義來看，作為「文化」的「田野」指向特定社會群體習得並共用的觀念體系與生活方式，且始終涉及「誰」、「哪裡」等具體界定要求。而全球現代化進程不僅使「當地人」內部複雜化，也使其與外界的交流日益頻繁，還使研究者的文化屬性及其與研究對象的關係狀況日趨多元且彼此跨越。所以，指向「田野」的「文化」早已不能被假定為簡單、同質、固定與封閉的經驗事實，而是更多包含當地人的具體社會實踐過程。其變得更複雜、流動、開放和多元，同時也與其他社會文化體系聯繫緊密、相互影響。

一、引論：「家鄉」作為「田野」的研究

在上述前提下，研究者要如何理解「家鄉」？王銘銘（2008a：4）將其區分為兩層：作為歷史事實的家鄉和作為心理事實的家鄉。他從外部邊界和內在共性兩個關聯的方面定位家鄉的具體含義，並認為起點是後者。在此基

礎上，筆者從「田野」的雙重含義入手，希望進一步澄清「家鄉」（擴展到「本土」）的內涵：1. 其經驗含義指向個人成長過程所處的時空環境及其所屬的社會群體；通常與血緣、地緣等日常經驗和記憶表述相連，比如家鄉、家園、故鄉、故土、出生地、祖籍／籍貫及祖國等。與此相對，「異鄉」（擴展到「異域」）指向個人所處時空和所屬社群之外的地方和領域，也可理解為「他者」的「家鄉」；2. 其理論含義可提升至更普遍、抽象的社會文化類型及其對照的價值觀念體系，代表個人所屬的村鎮、地域（社會）、族群（包括種族）、民族、國家、地區甚至人類，可以表述為X地人、X族人、X國人、X洲人、全人類等。與此相對，「異鄉」同樣可以作如此概括，用以代表個人所在時空和社群之外的「他者」的社會文化體系。兩層含義既有一致，也有差異，且都有相當的彈性。

家鄉不是孤立存在，也非與異鄉形成簡單對照，而是與其他，特別是相鄰的社會文化體系產生交互，從而構成更大的社會文化系統的一部分。作為田野的家鄉，既有共同性和圈層性，也有伸縮性和融合性，還有開放性和變化性。特別是在全球化時代，家鄉與異鄉的邊界日趨模糊，彼此之間留下更多相對意義。它將地方性和全球性集於一身，導致「自性」與「他性」的全球混融。家鄉人的角色身份和關係網絡也日趨分化和複雜化，並與異鄉人發生關聯和轉化，在個人身上造就出雙重或多重文化身份的交織狀態。甚至每個人都可能將全世界作為棲居之地，在文化歸屬和身份認同上呈現多元主義、世界主義或無家可歸的狀態。但這不意味著家鄉與異鄉的獨立性和邊界性的消融，也不意味著兩者的差異和分歧的消失，而是表明一種「地方性本身的轉型」（Tomlinson 1999：29），形成更加開放互通、多元流動的全球地方性。因此，家鄉內部以及與異鄉之間的一致與差異、融合與衝突、傳承與變遷的問題複雜性依然不能小覷。

那家鄉研究的「家鄉」究竟指「誰的家鄉」（Greenhouse 1985）？答案是研究者的家鄉，即研究者成長過程中的所屬社群及所在時空。這樣，家鄉研究既與家鄉學者的文化身份關聯，也和異鄉研究及異鄉學者對照。進一步說，家鄉是研究者和當地人共同的家鄉。兩者共享、共用當地的自然環境與社會文化構成的生活經驗，通過家庭、親屬、方言、行為、土地、房屋、職

業、生活、習俗、觀念、符號、象徵、歷史、記憶、交往、互惠等社會媒介與關係紐帶，自然、有機地聯繫起來，形成相對穩定、持久的共同體意識。當「家鄉」範疇從家族、村落伸向地方社會、民族國家、地區洲際和全球社會時，其包含的具體、生動的集體意識和歸屬感、認同感會逐步脫離日常生活的交往紐帶，成為被地方、國家，甚至更大的社會群體、權力結構及主流意識形態建構和渲染出來的抽象、宏大的共同意識與文化認同，並與地理、語言、歷史、民族、國別、種族、宗教、經濟、制度、法律、組織等結構因素交錯重疊（Tenzin 2022a）。在全球化與地方化雙向對流背景下，家鄉共同體的文化共識背後既潛藏更多源自家鄉群體（包括家鄉學者）內部的文化歸屬和身份認同的多元性和變化性，也連接家鄉人（包括家鄉學者）與異鄉人（包括異鄉學者）的文化差異與認同分歧的複雜性和交錯性。因此，其中既存在邊界區分，也存在聯繫轉換，在田野情境中不斷生成並展開。

但這些只是學者外部的客觀定義。要進一步明確「家鄉」和「本土」的範疇內涵就要轉換理解角度和定義方式。這涉及當地人從自身角度出發進行的主觀定義，具體分兩個層面：一是當地形成的民間定義，即當地人理解的「家鄉（人）」或「本地（人）」是什麼；二是當地構築的官方定義，即當地政府定義的「家鄉（人）」或「本地（人）」是什麼。這些定義方式隨主體、情境和實踐的變化而調整，形成靈活多樣且富於張力的「家鄉」和「本土」的內涵體系（桑山敬己 2019：20；Ferguson 2018：190）。並且，不同定義者界定的「家鄉」和「本土」範疇內部的價值體系和意識形態，既與其身份歸屬與群體認同密切關聯，彼此之間也存在相當的立場分歧和價值競爭（潘英海 1997：67-68）。

總之，廣義層面，「家鄉」與「本土」（重點指向「民族國家」）範疇重合，因而家鄉人類學或家鄉社會學與本土人類學或本土社會學，尤其是國家人類學或國家社會學相互指涉；狹義層面，「家鄉」本身構成「本土」的一部分，因而家鄉人類學與家鄉社會學也構成本土人類學和本土社會學內部的一種具體類型；從全人類角度說，張峻（2010：41）認為「人類學從來研究的就是『我們』人類的科學……本土（家鄉、主體）人類學更是研究小地域範圍內『我們』的生活和社會世界。」因此，本文所指的家鄉與本土研究

就是學者研究自身（早年或一直）所屬的特定社會文化體系的人類學或社會學，其核心特點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共存、共處於同一自然與社會環境，共享、共用一套相似的文化價值體系，在動態關聯與交互影響中與異鄉學者的異鄉研究形成對照。這些豐富內涵及其變化要在研究者的田野工作面臨的情境、角色、身份，以及與當地人的關係、互動、認同經驗中具體定位與靈活調整。

由於筆者將自己家鄉——浙北鄉村（中國大陸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漢族村落）作為核心田野點，因此也會遭遇家鄉與異鄉研究的利弊之爭。長期以來，雙方爭議不斷，共同源于研究者在田野工作、民族誌書寫和學術交流過程中遭遇的多重角色身份的辨識困境與轉換挑戰。其中的核心方法論問題是研究者與當地人的文化距離和文化身份如何影響了田野研究的過程和結果，而家鄉學者因其既有的角色身份和關係網絡在當地社會的交錯重疊而使這些問題變得更為錯綜複雜（Hume and Mulcock 2004：xviii-xix）。並且，家鄉學者常常通過揭示和批判異鄉學者的研究侷限凸顯自身的研究優勢，導致其對於自身侷限的認識和反思不足（陳美華 1999）。這尤其體現在當代中國大陸的人類學和社會學界（Tenzin 2022b）。為增強對家鄉與本土研究的自我反思與批評，同時跳出西方人類學緊盯的民族誌的文本與寫作的主流反思路徑，筆者希望以異鄉研究為對照，再度討論家鄉研究中尚未澄清的方法論問題：首先，以中國為起點，梳理並檢討家鄉與異鄉研究的方法論爭議的歷史與觀點；其次，結合浙北鄉村的田野經歷，透過筆者的角色身份、與當地人的互動關係、個人特徵及相關影響因素，具體考察（近距離的）文化背景如何影響家鄉學者的田野工作過程；再次，回到方法論層面，在與異鄉研究的比較中重新探討家鄉與本土研究的特點（方法、策略、後果、目標和路徑）、優勢、侷限及其克服之道，借此澄清文化距離與文化身份對田野研究及論著書寫和學術交流的複雜（特別是負面）影響，並與前人相關研究對話；最後，從自我反思角度對上述方法論問題進行總結、反省與前瞻，以此指向一條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家鄉研究的自我認識、檢討與超越之路。

二、家鄉研究的方法論爭議：歷史與觀點

家鄉與異鄉研究的方法論之爭是貫穿整個現代人類學發展史的核心問題。在自我與他者或我們與他們、家鄉與異鄉或本土與異域，以及主位與客位、主體與對象等一系列預設的二元對立前提下，經典時代的西方人類學將田野研究的首要目標瞄準「他者」，希望從雙方的差異比較中認識和反思自身。與其相對，從民國時代開始，以費孝通為代表的早期中國人類學家遠渡重洋，去歐美國家學習社會文化人類學，並率先將田野方法用於中國。費孝通的《江村經濟》（2007）首開家鄉人類學先河，成為中國本土社區研究的典型代表。其導師Malinowski從一個西方（英國）社會人類學家的角度出發，高度評價費孝通以本國公民身份研究本國社區（家鄉農村）的做法，認為他開創了西方人類學田野研究的「新傳統」（同上引：7）。後來，林耀華（2008）的《金翼》、許烺光（2001）的《祖蔭下》和楊懋春（2001）的《一個中國村莊：山東台頭》等漢人社區研究，都延續了家鄉或本土取向的人類學或社會學研究路徑，只是在具體主題和內容上各有側重。

從學術身份的文化分野看，費孝通等人早期均在歐美國家接受學術訓練，並在西方學術話語中寫作，也將相關成果先發表於西方學界，後譯成漢語引入中國學界。據此說，他們兼具西方與中國人類學家的雙重身份。從西方角度看，他們對中國的調查研究成為西方人類學傳統的一部分，只是被當時西方學術主流邊緣化了。從學科和文化的交叉關係角度看，這些研究不僅兼具人類學與社會學的雙重性質，也兼具針對西方學界與中國學界的雙重指向；既處在兩者夾縫中、受到雙重挑戰，也起到巨大的跨學科、跨文化的交流與比較作用。同一時代的美國文化人類學家Ralph Linton在評價楊懋春（同上引：序言頁4-5）的《一個中國村莊：山東台頭》一書時也坦誠了這種積極意義。華裔人類學家許烺光的人生經歷與學術貢獻則是更鮮明的例子。後來，以費孝通的《江村經濟》為代表的早期田野研究被Maurice Freedman為首的西方人類學家看成「社會人類學的中國時代」的標誌，並成為西方「漢人社區研究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這種做法也遭到固守科學傳統的西方人類學家非難。和Malinowski及Linton的開放態度不同，Edmund Leach（1982：124）就認為在費孝通等人的家鄉研究中，研究者「本然」無法與當地人保持距離，因而無法像在異文化中那樣保持敏銳性和洞察力，也無法在田野調查和民族誌寫作中保持「客觀」、「中立」及「理性」，而保持遠距離和陌生性的異鄉研究能更好達成科學民族誌的學術目標。從經典（科學）民族誌主張的距離、差異、外部、理性等研究立場才能呈現一種文化的客觀性、真／事實性的知識論與方法論準則看，「在家」的田野工作始終處於邊緣且負面的學術境地。此種主流傳統與研究取向認為，田野必須與家鄉和自我分離，與異鄉和他者親和。田野工作中研究者的主要角色是「公正的旁觀者」、「忠實的（事實）記錄者」，並且堅信「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客觀性立場。如此，異鄉人或外來者身份變得關鍵和有利，而家鄉人或當地人身份變得尷尬和不利，甚至成為一種出生身份上的學術「原罪」，造成家鄉或本土研究者的長期「自卑情結」（Kanaaneh 1997：4）。

這其中隱藏了英國乃至整個西方經典人類學的集體共識：田野首要指向以殖民地為依託的，封閉單一、低度分化、充滿異域風情的調查地點，特別是帶有「過去」、「原始」和「自然」設定的簡單社會，也包括遠離現代西方工業文明的、無文字的採獵部落、遊牧民族，以及相對「落後」和「傳統」的鄉村社會、農業文明或少數民族。大型複雜社會和文明社會，尤其是西方學者的家鄉——歐美國家的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很難成為其合理的田野對象。早期人類學的學科發展與科學取向也與西方殖民統治的歷史命運聯繫緊密。前者既以後者為社會保障，受到後者的權力支持與資金贊助，也為後者提供學術知識與政策服務。因此，無論是從捍衛西方科學精神，維護其正統學科地位的學術角度而言，還是從鞏固西方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學術—文化霸權，維護其對非西方國家的殖民統治的現實角度來說，Leach等人批判費孝通為代表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家鄉或本土人類學都頗為「合理」。

此種學術爭議背後還直接關聯更大的世界政治—經濟轉型背景。20世紀60年代以後，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相繼完成，西方殖民力量整體衰落，世界格局因此發生深層轉變，進入一個交流更密切的「後殖民主義」

時代。殖民與解殖、霸權與反抗的力量相互交錯、彼此滲透，「本土主義」（indigenism）的思潮與運動也在世界各地全面開花，導致西方經典人類學指向的「他者」，特別是Malinowski式的田野更難真實存在。經典人類學的學科框架由此受到嚴峻挑戰。20世紀70-80年代以後，西方更是出現大批人類學家對「異鄉作為田野」與異鄉人類學及其科學取向的理論反思和方法變革。家鄉／本土研究與異鄉／異域研究的優劣之爭也和上述學術—社會潮流交錯並進，延續至今，成為中國大陸、臺灣、香港等華人社會、其他第三世界國家、西方國家乃至全球人類學與社會學的核心方法論議題。經歷大量論爭和艱難轉變後，家鄉與本土取向的人類學或社會學在全球日益匯聚成一種鮮明的「本土轉向」（Tenzin 2022a），共同邁向一個備受關注和承認的「新階段」（Clifford 2013）。

家鄉／本土人類學家是在反思和批評異鄉／異域研究的方法論侷限中成長起來的。他們認可參與觀察、如實呈現文化「真相」的方法重要性，強調一種局內人的客觀性宣稱（潘年英 2001；Kanaaneh 1997），挑戰異鄉／異域人類學家的局外人的客觀性宣稱。這種主張繼承了Malinowski與Linton有關家鄉／本土研究的優勢和意義的核心觀點，且走得更遠、揚己抑人。仿佛「我生於斯、長於斯」、「我與他們背景一樣」就一定比單純「我到過這裡」、「我訪問過他們」更能接近當地人的意義世界（Haniff 1985），也更具理解力和發言權，甚至「鄉土的事情只有鄉土人才明白」（桑山敬己 2019：128）。一些家鄉學者也將「近距離」與局內人的客觀性綁定，強調自身在進入、語言、角色、身份、關係及觀念的理解和溝通方面存在先天優勢，而異鄉學者在這些方面存在難以克服的先天侷限，誇大家鄉或本地的文化身份對揭示文化真相的方法意義，轉而將文化身份「原罪說」交還給異鄉學者，卻與其對手一樣低估了研究者的角色身份及其與當地人的關係距離的多元性與可變性。兩者共同陷入研究者的文化距離與文化身份的位置結構決定論，容易滑入簡單、機械、封閉且對立的文化本質論或文化還原論，進而輕視研究者的主體性、能動性、開放性和策略性。通過文化處境的整體對比，更多家鄉或本土學者將異鄉研究的優勢和挑戰整體歸結為文化距離過遠、文化身份生疏造成的「進／深入難、出來易」的問題，因此容易「隔靴搔癢」；將家

鄉研究的優勢和挑戰整體歸結為文化距離過近、文化身份親密造成的「進／深入易、出來難」的問題，因此容易「當局者迷」（王銘銘 2008a；末成道男 1993；費孝通 2004；韓敏 2011；Hockey 1993）。

比較來看，雙方的核心方法論精神並不一致：異鄉人類學強調他者、異鄉、局外、理論（知識）、客位、主體（研究者）、觀察、呈現、解釋、客觀、理性和科學等對於研究和說明特定文化中的事實「真相」的重要意義，以此批判家鄉／本土研究的內在缺陷；家鄉人類學強調自我、家鄉、局內、經驗（常識）、主位、對象（當地人）、參與、敘述、理解、主觀、情感和人文等對於瞭解和表述特定文化中的事實「真相」的重要意義，以此批評異鄉／異域研究的內在缺陷。這些方法論爭論也逐漸演變為兩個學者群的對立。他們都堅稱自己的方法論立場是客觀性的根本來源：前者以「研究者（的主體性和權威性）」為中心，將重心放在研究者對當地人的、外部的冷靜觀察、客觀描述和抽象分析之上，且以異鄉人或局外人的角色身份作為自身優勢所在；後者以「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交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和權力關係」為中心，將重心放在研究者與當地人的內部交流，以及對他們的切身體驗和同情敘述之上，且以家鄉人或局內人的角色身份作為自身優勢所在。總體來看，這些以「自我」與「他者」的抽象二分為核心前提的家鄉與異鄉研究的方法論之爭都太過簡化和極端，需要放入更多田野情境中詳加考察和檢視。

這種爭議背後還涉及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家鄉／本土人類學批判、反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術—文化霸權、追求學術獨立和文化自覺的強烈訴求，因此帶有鮮明的民族國家立場、意識形態取向和實用主義品格，力圖為民族解放、國家建設、政府治理和人民生活服務。第三世界學者的本土知識與文化體系建構中也存在明顯的本土弱勢文化對西方強勢文化的反抗、正義、自決和解放意圖。不僅如此，家鄉／本土研究還在西方人類學內部廣泛興起，日漸受到西方主流學界的更多關注和認可。這表明現代人類學確有反思「距離」、超越遠方「他者」的轉變需要。並且，在檢討西方異鄉人類學和科學民族誌的權力優勢與殖民問題，尋求本土知識與文化體系的獨立、自主、合法性和行動力，以及與其他學術—文化體系的平等對話和相互尊重方面，非西方和西方內部的家鄉和本土人類學功不可沒（Harrison

2010；Smith 2021）。其與1970年代以來以「後殖民主義」為代表的其他西方學術思潮也相互批評、彼此融合。

因此，此種爭議也捲入並強化了中心與邊緣、西方與非西方（中國）的學術—文化權力格局之爭。從早期宣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愛國主義傳統到近期強調中華民族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中國大陸的官方政治話語一直希望改變長期受西方，特別是美國主導的既有世界體系格局。與之配合的官方學術話語是將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作為形成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目標指向，以增加中國在世界學術體系中的影響力和競爭力。由於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文化、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高度一致和過度親密，導致很多中國尤其是漢族學者受上述主流政治與學術話語塑造明顯，迫切希望形成一種「中國中心主義」（梁永佳 2019；項飆 2009）立場，在世界學術體系中尋求中國學術話語的獨立性、獨特性與自信心，甚至將其上升為更普遍的方法論準則。為抗衡西方學術—文化體系的強勢影響而在中國的學術—文化與國家—民族之間進行捆綁和統一，這種做法既可能激發批判意識和創造力量，也可能引發學術民族主義、文化本質主義、我族中心主義和「顛倒的東方論」，甚至帶來學術—文化的「自我殖民」、「自我東方化」等風險與挑戰，增加封閉性、排外性、自負性和擴張性，從弱者角度強化中西二元對立格局（黃宗智 2005）。一些中國學者對此外部方法論困境已有所警醒，但主要停留在歷史、文獻和理論層面，既少有結合家鄉／本土研究的田野工作經驗進行自我檢討和自我批評，也少有直面和反思自身在國際學術—文化場域中的身份、處境和實踐帶來的深層侷限。

相比之下，更容易忽視的是家鄉或本土社會內部的群體差異與等級體系帶來的學術—文化權力不平等問題，或者學術—文化的內部殖民與霸權問題。以大陸學者王銘銘為例，當他以「我者／本文明為中心」（王銘銘 2008b）、以「家園」為方法（王銘銘 2021）、以「關係主義」和「人已雜糅」的「超社會體系」（王銘銘 2015）為一般理論架構來理解和解釋中國文明體系時，直接對接傳統中國的「天下觀」，以此建立「三圈說」的本土人類學解釋框架。這種突出「中國的世界秩序」和「中國的世界智慧」（同上

引：154）的本土解釋模式，以漢族、中原地域、儒家文化和中央皇權為中華文明的核心內涵，通過朝貢體系和五服制度等制度實踐及其文化想像，將核心圈、中間圈與外圈之間的等級結構與互動模式凸顯出來，與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的以西方文明為中心的「世界體系理論」形成對照。但是，這種「中國中心觀」有很強的精英主義取向，其理論意圖與現實關懷將核心圈作為起點和歸宿，揭示並強化自身的優勢位置，由內而外地擴展核心圈對中間圈和外圈的文化輻射與政治統治思維，最終將民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危險和麻煩集於一身，用一種中國本土理論模式復刻了「西方中心觀」。作為以「本文化」為中心的、普世化的「超社會體系」的中國表現形式，其也在中國文化體系內部鞏固並擴大了中心與邊緣的矛盾對立。這些內部方法論困境既源於中國尤其是漢族的家鄉或本土學者對中華文化內外各種「他者」的多元性和差異性的理解，以及借此對照與反思自身的不平等性和不深入性，也源於他們對自身在大陸學術—文化場域中的身份、處境和實踐，及其深層侷限的反思與批判的不完整性和不徹底性。

由此可見，研究者在面向世界的地方化或本土化的田野工作、論著撰寫及學術交流過程中，都存在因自身文化背景（文化距離和文化身份）及其與當地人的交往關係而產生的現實困境和學術挑戰。這些問題都需要研究者的反思與實踐相互配合、攜手並進。尤其是家鄉學者在批評異鄉研究的種種不足並宣稱自己在進場、語言、文化、角色、身份、關係、溝通、理解、批判、反抗等方面的近距離優勢時，並不能沉溺其中，豁免對自身侷限的反思與超越，而是要拿出徹底面對「自我」和「我們」的學術勇氣。為將此種學術爭議，尤其是將家鄉研究的優勢與侷限的自我反思與自我批判落到實處，推進有關研究者的文化背景對田野研究的影響問題的深層檢討，筆者希望首先深入浙北鄉村的田野調查過程進行具體的探討與比較。

三、重回家鄉：浙北鄉村的田野工作過程反思

（一）將文化距離與身份問題放回田野工作過程

隨著全球現代化進程和「田野」概念反思的雙雙深入，很多學者強烈意

識到「當地人」不是大寫的「單數」，而是小寫的「複數」。其內部由眾多異質、變化的人群組成，並且與其他文化中的人群交流頻繁。「當地文化」也不是一種抽象、同質的總體類型，而是不斷展開的鮮活經驗。其內部的共性和差異、穩定與變化是以具體且豐富的個人行動和社會互動展現出來的。其實踐過程既有無限的歷史性和綿延性，也有十足的可塑性和時代感；不僅吸收外來文化，也走向外地世界，最終形成複雜的雙向互動。就筆者的家鄉——浙北鄉村來說，由於受到家族、血緣、地緣和儒家倫理等因素的持續影響，當地農民在1978年之後既大膽「走出去」，也頻繁「引進來」，既將皮革、經編、家紡、建材、小家電等本地特色產業與國內外市場連成一片，也將全球現代化進程中的西方價值觀念與生活方式和本地傳統禮俗人情與生活方式碰撞融合，導致年輕輩和中老年人的觀念分歧日盛，由此折射出中國式農村現代化路徑的複雜性。

與當地人的複雜特點相比，研究者的個性特徵、文化背景與學術身份及其對田野工作過程的影響同樣錯綜複雜，不能籠統區分為自我與他者、家鄉與異鄉、局外人與局內人、研究者與當地人等理想類型來解決田野實踐困境。因為兩者的「自我」都有關係性、開放性和流動性。所以研究者既要辨認他人的「自我」的社會位置以及與自己的「自我」的位置差距，也要反思自己的位置結構連同其他因素如何塑造與當地人的關係，以便在不同情境中適時調整身份認同（林開世 2016）。為此，研究者對當地人的理解和解釋須「以複雜應對複雜、以變化應對變化」，尤其要在文化背景塑造下的雙方之角色身份、關係網絡、交往場景和個性特徵中進行整體定位。其中的一致與分歧也是相當多元且富於變化。這些田野方法問題的提出，既要求對研究者與當地人的角色身份與交往關係的複雜性和變動性進行深度理解，也強調對田野調查的交流目標和民族誌生產方式的豐富性和矛盾性展開深層反思。

所以，要追問的是文化背景因素具體包含哪些？其對田野工作的影響通過怎樣的載體、方式或途徑展現？又如何與其他因素交織並共同作用？這涉及對研究者和當地人之間多樣的角色身份、社會關係、交往過程和個人特徵，以及捲入的情感、信任、權力、利益和倫理等因素的情境定位和靈活處理。有學者已經意識到，田野工作是一個自我（的多重角色）的理解（Zhao

2017) 與扮演 (潘峰 2007) , 以及與當地人交互影響與變化發展 (Sherif 2001) 的過程。但這不意味著放棄研究者的不同文化身份類型對田野研究影響的抽象探討, 而是先要將問題具體化並放回田野實踐中, 落實到研究者與當地人的具體關係和交往中, 聚焦對雙方角色身份、關係處理和個性特徵的經驗反思, 以及與異鄉學者的田野處境和調查過程的異同比較, 才能重新定位並反思文化距離與文化身份對調查過程和相應成果的整體影響, 否則容易陷入「唯方法論主義」(methodologism) 的學術陷阱。一些學者也從各自的田野經歷中陸續發現學術與生活的高度重疊造成的調查困境, 以及多重角色身份的扮演、協調與轉換的難度, 因此開始強調在研究者與家鄉人的交流過程中動態定位並處理兩者關係的重要性 (Cui 2015) 。不過, 這類田野反思目前依然較為零散。筆者希望結合自身田野經歷展開更完整的經驗解析與方法反思, 在此之前先要對家鄉的田野調查情況做簡要介紹。

浙北地區位於錢塘江入海口, 包括杭州、嘉興和湖州三個地級市, 緊鄰浙東、浙中、上海和蘇南等地, 是長江三角洲的核心區域。筆者重點調研H市¹ (嘉興市下轄縣級市) 花園鎮上的三個村子——新村 (筆者父親所在及筆者成長之村, 也是行政村)、山村 (筆者母親長大的行政村) 和西村 (筆者小姑外嫁的行政村)。2008年寒假至2014年暑假的五、六年間, 筆者往返於高校與家鄉之間, 或者深入全國各地的老鄉群體中間, 持續追蹤浙北鄉村的經濟轉型與社會變遷問題。2014年秋天進入博士階段後, 筆者將問題意識聚焦到浙北農民的禮俗人情生活領域, 希望借助日常生活再生產的微觀邏輯透視當地農村經濟—社會運行與變遷的宏觀邏輯。之後兩年的寒暑假, 筆者從身邊的家人、親友和鄰里入手, 結合自己的生活經歷和儀式記憶, 對人情往來和儀式活動進行初步探查。2017年春天正式開題後, 筆者於當年4至9月回鄉進行近半年的田野調查, 最大限度融入當地人的工作、生活與日常交往之中。實地調查持續到2020年寒假, 後因地方政府的疫情管控日趨嚴格而改為和一些報導人進行不定期地線上交流, 一直延續到2022年底疫情管控結束。

1 出於學術倫理需要, 文中縣市及以下的地名和相關人名都做了技術處理。

在此期間，筆者順著既有的親友網絡和熟人關係在周邊村落擴大訪問對象，對不同背景的村民及其家庭展開深入訪問，既追尋他們經驗記憶中的禮俗故事，也關注近年來發生在他們自己、家人和周圍熟人身上的最新動態，還將訪問對象擴展到在外，尤其是在周邊城市求學、經商、工作和生活的家庭成員和親友老鄉，同時將目光伸向地方史，在當地各級圖書館網絡中查閱方志民俗資料和地方珍稀文獻，希望從中形成有關當代浙北農民禮俗生活（尤其是婚姻家庭方面）的歷史、實踐與變遷脈絡的完整經驗圖景（陳雲龍 2021, 2023；Chen 2023）。

（二）文化身份異同和田野的融入與展開

相對異鄉學者而言，家鄉學者的「本地人」和「本土學者」的雙重身份似乎不僅利於克服不同語言體系、文化背景、人際關係、生活方式和思維習慣造成的田野工作障礙，也利於將經驗研究和理論思考自覺關聯。但是，當筆者真正回到浙北村落駐紮時才發現，情況沒這麼簡單和樂觀。僅僅將自己歸為「本地人」和「本土學者」，然後在兩者之間協調轉換，根本無法應付複雜多變的實際田野處境。回鄉之後，筆者首先遭遇從城市到鄉村、從書齋到田野、從陽曆到農曆的時空轉換帶來的環境適應問題，尤其是生活作息的調整要求。過去十多年裡，筆者像候鳥一般在學校和家鄉之間來回，形成一種「兩棲」生活模式。每次回鄉，筆者都會探訪不同村民，與他們保持良好關係。但看似共同的文化背景和親密關係也難以彌合筆者與他們在工作、生活與交流方面與日俱增的現實差距。

這種差異感和距離感主要源自筆者常年在外求學和工作的經歷。因為高等教育關聯著以大中城市和學科專業（影響到職業、婚姻和社交）為基礎的現代觀念體系與生活方式。這與當地的傳統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差別甚大。由於流動性和跨越性的長期存在，筆者「在近與遠這兩個因素之間產生了一種特殊的張力」（Simmel 1971：148）。每次回鄉之初，筆者都會強烈感受到一種夾在陌生與熟悉、外來與本地、國語與方言之間的尷尬氣氛，直到在家生活多天以後才能重新恢復與周圍親友和鄉鄰的日常交往。時間越久、互動越多，人際隔閡的消除效果越明顯，筆者對各種當地的角色、身份和關係

的把握和切換也越熟練。但是除了半年集中調查外，筆者總是在寒暑假來去匆匆，因此深感自己這種融入是有距離和限度的，日益成為橫跨不同社會生活環境的「次原居民」（張少強、古學斌 2006）或「部分局外／內人」（Jahan 2014；Narayan 1993；Sherif 2001）。這既進一步拉開筆者與家鄉的文化距離，也導致「自性」與「他性」在筆者身上的充分融合。

當然，這種內與外、我與他的互通互動和變化雜糅也發生在本地村民身上。改革開放至今，當地工業和市場發達，民營企業眾多，很多村民從半工半農的狀態逐步轉向單純進廠上班的狀態。一些被訪者更戲稱自己是「住在鄉下的街上人」。不過，他們還是深受以「節歲」為核心的農曆時間影響，與遵照以「星期」為核心的陽曆時間的城市職業與生活方式差別甚大。近十幾年來，當地城鎮化水準快速提高，大量年輕農民進入附近鄉鎮、縣市或地級市工作和生活，一些中老年農民也先後進城幫子女帶孩子，成為一批「住在街上的鄉下人」。他們在城鄉之間穿梭，工作日在城裡照看孫輩，節假日回鄉下處理農事，順便把現代工業生活與城市時間觀念一併帶回農村，由此實現兩邊的適應與融合。

筆者既想不耽誤當地村民的工作與休息，又想多和他們進行互動與交流，就要掌握其生產生活節奏，選擇恰當的時間、地點和方式，也要調整自己熬夜寫作、晚睡晚起的作息習慣，以適應對方的時間節奏，好讓田野工作順利展開。因為在他們忙碌或休息時貿然探訪，既有失禮貌、不合時宜，也會招致敷衍和反感，甚至吃閉門羹。這些差異本身就說明筆者這個「本地人」的陌生化和他者化的一面，而生活作息的本地化轉換也並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時間過渡。筆者回鄉之初就頗為不適，生活一段時間才能重新融入其中。可見，家鄉學者在進入田野現場時也面臨適應當地的時間節奏和生活習慣的問題，只因借助過去的生活經驗和關係網絡能相對更快地熟悉和融入，而一些個性外向、善於交際且學習、適應能力強的異鄉學者也能借此順利解決此類問題。

適應當地的生活節奏以後，筆者急需面對「我如何向家鄉人表述自己的角色身份和田野調查的目標與內容」、「我如何穿透他們的社會—心理防線並展開深入的訪問和交流」等現實問題。這就要徹底進入各色互動場景。此

時本地人和本土學者的文化身份會被完全剝開，由此轉向更加具體的角色、身份和關係處理。異鄉學者在當地的角色、身份和關係都是新建或獲得的。除了宣佈外來學者的身份外，他們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和當地人交朋友，借此融入並展開觀察和訪問。但對家鄉學者而言，大多數角色、身份和關係（比如家人、親屬、鄰里、同學、朋友、老鄉等）都是既定且無選擇的，也是長期且不可擺脫的（翟學偉 2011：297-304），外來的博士、學者等角色身份要納入家鄉內部進行理解和定位。因此，在與家鄉人的日常交流中，筆者的「自我」會展開成諸多角色身份，產生多元交錯的定位與轉換問題，由此形成「情境性身份認同」或「多元主體性」（Rosaldo 1989：168-195）的田野挑戰。就此而言，家鄉學者比異鄉學者遭遇的田野互動情況更複雜，角色身份轉換與關係處理難度更大。

異鄉學者除了進入並獲得當地人的信任較困難外，一旦被接納，其在當地社會的角色身份、關係性質和互動模式相對更簡單、明確。他們一般以外來學者或友人方式展開交往，在必要時可以通過「外（來）人」身份與當地人保持距離，以免過度捲入當地的諸多情感、利益、權力和倫理紛爭，給自己的調查工作和個人生活造成負面影響。家鄉學者則更少具備這樣的自由性和選擇權。其田野工作過程更深入、直接地糾纏於各種當地的角色身份和關係網絡。這種熟人關係的深度捲入，要求家鄉學者必須嚴格遵照當地的倫理和禮俗，恰當定位並理順自己在其中的各種角色、身份和關係狀況。整個調查過程也要應對更多源自本地的信任、情感、權力與利益因素的羈縻（傲東白力格 2006：85-87）。

那筆者要如何利用與家鄉人共享的社會文化系統，通過既有的角色身份和關係處境，克服進入當地人生活世界的難題，解決與村民溝通不暢、交流不深的問題，又要如何利用自己在外求學、工作生活以及專業訓練造成的文化距離與身份差異（作為一名習慣城市生活和學術工作的博士或學者），在與當地村民的日常交往與關係處理中避免各種因素的過度捲入帶來的負面影響，從而保持外部、客觀、理性的認識、比較與反思立場，由此實現兩邊的身份立場的互補與平衡？因為在田野研究中，這樣既能在關鍵之處層層深入，也能在必要之時儘量抽身。

(三) 家鄉學者的訪問策略、關係處理與溝通技巧

考慮到上述目標後，筆者的主要訪問策略是先探訪不同背景的親屬、朋友、鄰里、同學或熟人，後通過他們的熟人圈子擴大訪問範圍，選擇訪問對象。具體形式分「正式訪問」和「非正式交流」兩種，涉及個人、家庭和群體三類談話情境。正式訪問前筆者會事先向他們說明自己的學業和研究的基本情況，以便獲得對方的理解和支持，同時排除受訪意願不強烈者，然後根據對方方便約定探訪時間。在周邊企業上班的人沒有固定休假，訪問他們只需約好特定日子；若要訪問在鎮上或周邊城市的企事業單位、政府機關上班的人，最好把時間定在週末或法定節假日；而要訪問在家的中老年人，只需避開農忙時節即可。綜合考慮，筆者通常將正式訪問安排在週末或法定節假日。這樣既有足夠的時間交流，也有更多機會接觸被訪者身邊的家人親友，以便邀請他們一起參與相關話題討論。正式訪問又包括兩種：一種是筆者登門拜訪，這更多屬於「做客」；另一種是邀請他們前來家中相聚，或在周邊市鎮的餐館吃飯、在奶茶店或咖啡館喝茶聊天，這更多屬於「請客」。

「做客」要早點出發，儘量在上午九點半之前趕到，因為常是家裡的中老年人做飯。他們習慣早起，做和吃午飯的時間都很早。出發前要根據被訪者及其家庭成員的年齡、性別、健康狀況以及與筆者的關係選擇合適的小禮物。探訪年長者要帶些不太貴重的營養品、保健品和新鮮水果表示心意，探訪同齡人要給他們的孩子帶些牛奶、飲品、禮包或小玩具。遵照當地的做客禮儀，筆者既能以恰當的角色身份表示對被訪者及其家人的尊重和關心，同時避開博士學歷和學者身份給他們造成的心理壓力和文化障礙，也能快速消除許久未見的陌生感和疏離感，將話題順利引向深入。早去還能贏得更多的聊天時間，且可以和被訪者的家庭共進午餐，還有機會和他們全家甚至來串門的親友和鄰里集體交談。但飯後不能停留太久，以免耽誤他們午休和下午勞作。這些禮節和策略既能給他們留下謙虛禮貌的印象，也能增進相互的理解和交流，還便於下次有需要時回訪。

「請客」的主要形式包括「在家」和「在外」兩種。在家請客，筆者會邀請年紀相仿者來家中喝茶聊天、共進午餐，分享和討論各自的戀愛、婚姻與家庭生活經歷，所以在準備豐盛食材之餘也要多備些瓜果、零食和酒水，

以便飯後將討論延續到下午；在外請客，筆者會根據對方的情況，就近找本地口味或對方喜愛的餐館聚會，同樣邀請與筆者年齡和背景相近者，通過敘舊方式展開討論相關話題，鼓勵他們講述自己和身邊的故事，發表個人看法，意猶未盡時再轉戰附近的奶茶店、咖啡店等適合聊天的地方繼續，直至傍晚散場回家。這樣既能表明筆者對他們的熱情與尊重，也能增進大家對共同關心的生活話題的交流與探討，還能鞏固雙方長期以來的關係與情誼。

正式訪問不算太多，更多是自然情境中的交流或談話。主要情形也分兩種：一是晚飯後外出散步或串門，沿途加入各種場合的村民閒聊隊伍。這是筆者田野調查的常備策略；二是更隨機的碰面和談話方式。比如因生活需要，筆者陪家人上街買菜、去超市購物、去理髮店理髮、去醫院看病、去村委會辦事，以及外出坐公交，在途中時常偶遇一些親友和熟人，在詢問他／她們的近況以表關切的同時自然延伸到相關問題的探討上。還有一個重要的參與觀察與訪談途徑是收到對方邀請，以親戚、鄰居、老同學、老朋友等角色、身份和關係，直接參加當地人的重大人生儀式（婚嫁、生育、做壽和喪葬禮儀等）與集體社交活動（村級晚會、同學會和老鄉會等），然後找準時機進行觀察和訪問，就相關禮俗問題和當事人及其家人親友進行廣泛、深入地交流，收集更多故事和資料。

在非正式或村民自然聚集的聊天場景中，筆者會將自己定位成熟人社會中的普通成員，以XX（家）的兒子、侄子、外甥、鄰居，或XX的同學、朋友等當地角色身份出現，並將博士和學者的外部角色身份順帶融入，更多扮演「好奇的聽眾」，而不是意見領袖或輿論權威，鼓勵大家暢所欲言、「自由發揮」，在適當時機就自己關心的問題展開問詢和交流。這樣雖無法完全將討論方向引導到自己的研究議題上來，但能迅速融入當地人的生活語境和交流模式，從中獲得意外收穫。此外，筆者隨父母外出偶遇許久未見的遠房親戚、老朋友或老同事時也會感覺分外難得和親切，共同回憶過往，傾訴自家的人事變化與悲歡離合，以及目前的生活處境和工作狀況，相互添加最新聯繫方式後不捨分別。這樣既能獲得必要的信息補充和個案拓展，也可修復並擴大之前的熟人網絡和鄉里情誼，為後續的聯絡和訪問提供便利。

總之，面對不同的被訪者，筆者先要認真考慮自己既有的角色身份以及與對方的關係定位，比如我，甚至我的父母、至親和他／她（們）的關係為何？到底是何種親戚、鄰居、朋友、同學、老鄉或熟人？以前我們，甚至雙方家庭的感情、關係或交情如何？然後找準時機，以當地人最容易理解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調查訴求與研究目的，方便對方深入瞭解我的來訪意圖，卸下心理防備，相信我的調查不會對他們的生活造成困擾，進而敞開心扉、暢所欲言。所以，想要順利打開談話局面，就要弱化博士、學者等「局外人」身份標籤，隱藏自己與當地人的觀念差異和地位不平等，更不能特意強調自己所謂「高級知識份子」的身份地位優勢，而要借助各種本地的角色、身份和關係將雙方的交往互動過程平易化和柔軟化，以自然、得體的方式出現，然後融入，並以家鄉人能理解和想像的方式對自己的外部身份、來訪意圖和相關疑問作委婉說明。一些家鄉學者的研究反思中也提到了類似的困境遭遇和田野策略（同上引：85-87；Cui 2015）。

訪問過程中，筆者將常用的溝通方式概括為「敘舊式的談話引導模式」。用當地人的話說是會「講空頭」（閒聊）。筆者先要搜尋過去與被訪者相似的生活記憶開啟談話，再將其引向各自當下的生活領域，一面坦誠自己在外學習、生活與工作的經歷，表明瞭解當下農村的人情往來與禮俗生活是筆者要完成的科研任務，儘快拉近雙方距離，求得對方同情理解，一面引導對方圍繞關係處理、送禮問題和人生禮儀等方面分享相關的經歷和故事，並對自己的家人、鄰里和親友展開回憶和敘述，這樣才能在彼此的生命歷程中找到更多連接點來鋪開交流場景。這是一種先回到雙方生活史的早期「交匯點」將兩者的經驗世界聯繫起來，然後沿著各自的分岔方向逐步展開交流的訪問策略。比如，筆者去老同學阿炎家拜訪，一同回憶初中時代的老師同學和學習生活，仿佛一下子回到以前的校園場景，接連的笑聲打破了多年不見的生疏。之後，我主動談起後來的求學生涯，仔細介紹他不太熟悉的碩博階段的學習和研究情況，向他解釋博士論文的調查任務與寫作目標。在瞭解更多筆者的新近情況後，他除了誇讚以外，也感歎讀博的艱辛，並領會到筆者想深入交流的話題，於是認真講述他的高中和大學生涯，強調自己學習不算突出，在省內一所普通大學畢業後考進本市渣土辦混了個「鐵飯碗」，但

由於家裡經濟條件一般且左耳發育不良，擇偶屢屢受挫，後來花三萬多做了假耳修復手術後才順利成家。他隨即回顧了個人的婚戀過程、結婚開支以及婚後的孩子情況，與兩邊家庭的關係處理等，既表達自己的經濟壓力和生活苦惱，也提出個人對婚姻家庭的看法和思考，以及與老一輩的觀念分歧，還順帶向我介紹了近期結婚的周圍親友和同學的情況，強調現在鄉下的婚禮儀式越來越豪華和西化（陳雲龍 2023；Chen 2023），年輕人離婚也日漸增多。我們一同感歎社會變化太快，大家生活得都不容易。

可見，利用自己的經驗和記憶回歸當地人的生活與交往，採取將心比心、以心換心、坦誠相待、友好相處，由點及面、由己及人、由熟入生、由同到異的交流方式，遠比在家鄉人面前擺出一副冷峻嚴肅的學者姿態，遵照事先擬定的訪談提綱，科學嚴謹、居高臨下地詢問和記錄他們的生活來的平易近人、深入有效。相對異鄉學者的處境和策略來說，這種契合當地人的生活經歷和風俗習慣的經驗策略和溝通技巧也是本地學者更能充分利用和施展的調查方法。Peter Collins和Anselma Gallinat（2010）將人類學家關於家鄉的經驗和記憶看成是民族誌工作的有用資源。Lejla Voloder（2008）進一步強調了「用我自己、我的經歷和解釋來理解他人的經歷，以及他們與更廣泛的社會文化過程的交集」的方法意義。

比較來看，從全新或既有的角色身份和關係網絡出發，異鄉和家鄉學者與當地人交往與溝通時遭遇的具體問題不太一樣，應對策略也有所差別。貿然宣佈自己的學者身份和調查意圖，即便在當地有既存的角色、身份和關係鋪墊，也會拉大雙方的心理距離，造成對方的陌生、尷尬和茫然，甚至轉熟為生，從熱情、友好和開放變為懷疑、警惕和擔憂，更不會因此熟識背景而一直保持信任、尊重和坦誠（筆者以做博士論文名義向一些核心親屬詢問家中完整的隨禮記錄時就曾遭到各種警惕和婉拒）。可見，在獲取私密信息方面，至親關係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負擔或累贅。他們會擔心筆者在熟人圈中洩密，影響他們在村裡村外的日常交往。當然，信任問題在異鄉學者的田野調查中同樣存在，只是起始的角色、身份和關係處境並不相同。他們要在毫無過去的關係基礎和交往經歷情況下，通過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的辦法建立全新的角色、身份、關係和信任。那就是另一番交往困境和解決方案了。

(四) 當地人視角下的角色身份、關係定位與交流方式

要促成真誠交流，僅從自身角度進行定位和說明遠遠不夠，還要從對方的神態舉止和話語行動中觀察和判斷他們如何看待我的角色身份，如何認定我們及雙方家庭和至親之間的關係性質和關係狀態，如何權衡不同關係背後的信任、人情、面子、權力、身份、地位、利益和倫理等因素的影響，以及他們做出怎樣的表達和回答，隱含怎樣的意義和立場，夾帶怎樣的期待和要求，並以他們易於理解和接受的方式作出自己的解釋和回應。很多學者嘗試反思其中問題（毛偉 2009；郭佩宜、王宏仁 2006；Kanaaneh 1997；Lu and Hodge 2019）。就筆者的田野經驗而言，那些學歷較低、年紀較大、很少外出的（女性）家鄉人既不明白，也不關心田野工作和民族誌究竟為何？有何學術意義和社會關懷？其最關心的是筆者在外的學習工作狀況，然後通過自身的生活處境、經驗認識和價值觀念來對比雙方的現實差異，想像和判斷筆者的當下狀況和未來前途，還會將我的博士學歷和學者身份納入他們的日常生活來理解，尤其重視我對他們，及其家人、親友、村落和地方社會的實用價值（比如希望我當上國家幹部、支持家鄉發展）。即便筆者頻頻解釋自己的學術壓力、工作困境，以及普通的收入水準和社會聲望，他們依然表示是我「謙虛」了，並一再堅持對我的外部身份地位的理解和判斷。雖然其中有很多理解困境和認識偏差，但是依靠自我披露（self-disclosure）推動交流溝通依然能有效拉近筆者和家鄉人的心理距離，更快融入他們的談話語境，也能清晰地瞭解他們對我的外部角色身份定位與我自身定位的差異，進而思考造成這種認知差距的社會文化原因。

當談話重點從自己這邊轉移到家鄉人身上時，情況就更複雜了，不僅涉及不同被訪者對筆者的角色、身份和關係的情境定位，雙方的交流過程和談話內容也涉及諸多「自我」的印象管理和表演策略，並受到情感、臉面、權力、利益和倫理等因素的更深影響。在不同的關係定位與談話場景中，他們還會對筆者產生更多的期待和訴求。

親近和熟悉的關係能推動談話深入，使對方暢快表達，特別是涉及對他們來說是無害，甚至是正面、長臉、歡心、得意及感人的事。比如，為突出家庭和諧和尊重女性，小叔半開玩笑、半驕傲地說，「我家的地位排列是這樣的：

孫女最高，（兒）媳婦其次，之後是你嬸子，然後輪到我，最後是我兒子。我們家都聽女人指揮。我兒子聽全家人指揮。這樣一家人才和睦、幸福嘛。」筆者表示讚歎和羨慕。作為一位與他們關係密切且在他們眼裡有文化、明事理的晚輩，筆者的積極回應和充分肯定，構成他們對交流本身的期待、意義和動力來源。但在涉及某些隱私話題、敏感內容和切身利益，特別是對個人及其家庭來說是負面、丟臉、遺憾、悲傷或不利的時，一些家鄉人就會故意繞過或有所保留，時常面露難色、欲言又止、拐彎抹角、吞吞吐吐，甚至說些客套話和假話應付。他們不太願意正面訴說家裡的代際矛盾、擇偶困難、婚姻危機、兒女不孝，以及家庭成員的重大疾患、打架鬥毆、違法犯罪、生意失敗等詳細情況。比如，當筆者詢問新村的菊寶老太兩個兒子對她怎樣時，為維護自家臉面，她竭力強調「倆兒子都對我很好。一個承擔吃，一個承擔住，每月還給零花錢，過年還輪流喊我去吃年夜飯」，卻閉口不談兒子對老人滿口嫌棄、相互推諉的真相。很多家鄉人顧及與筆者的熟識關係以及連帶的人情面子與倫理義務，總想說些什麼又覺得難以啟齒、有失顏面，也害怕自家的私密信息被筆者洩露，在鄉村輿論中蔓延，導致他們在周圍人面前抬不起頭、難以做人。相比之下，異鄉學者不會駐留太久，與大部分當地人（少數關鍵報導人除外）也不會太熟，交往相對受限，私密信息的洩露風險較小，甚至說出去也未必有人相信。因此，異鄉學者如果能憑藉自己的遠距離和外來性優勢，輔之以積極熱誠的溝通策略，在成功取得當地人信任之後，在談及敏感話題或隱私事件時會比本地學者更能讓被訪者放心訴說。

研究者能否深入理解、意會談話內容及其引申意義，還涉及對當地的風俗習慣、語言特色、交談風格和被訪者的個性人格與社會背景的把握，而不單單是雙方的角色、身份、關係和信任問題。本地學者在這些方面的背景優勢相對明顯，諸如菊寶老太的場面之辭也更易被識別，外來學者在缺乏相關背景知識和當地生活經驗的情況下更可能被其話語蒙蔽。遇到此類難以推進的溝通場景時，筆者會轉移話題、緩解尷尬，另找機會和方法嘗試。一些十分關鍵卻難以從當事人身上獲取的經驗資料，筆者也會通過對其身邊的重要他人的側面詢問補充印證，或者選擇更隱秘、安心的場合對其單獨訪問。學術層面，這既能豐富和擴大信息資料的來源管道，也能檢驗其可信度和有效

性；現實層面，這既考慮到對方在人情上的為難，緩和緊張關係，也表明對對方的尊重，不至於影響後續交往。

還有家鄉人對筆者太過瞭解、放心和依賴，進而在談話中造成了太深的情緒捲入和情感期待。這方面，筆者常遭遇一些中老年人對自己的艱苦生活和辛酸經歷侃侃而談、飽含滄桑、潸然淚下。比如，在高中同學阿軍的婚禮前夜，我受邀做伴郎，提前到他鄉下家中過夜，方便明早一起迎親。當時夜已深，阿軍母親為我準備好床單被套之後卻遲遲不願離開。猶豫片刻，她眼眶通紅，拉著我的手小聲說道，「你是阿軍的好朋友，我和你說實話，到現在我還是有點接受不了。雖然女方家庭條件好，但是我們把阿軍辛苦養大，培養得這麼優秀，人不能白白『給』（入贅）了人家呀，以後怎麼也得生一孩子隨我們阿軍姓，你說是吧？」突如其來的話語讓我有些不知所措，趕忙安慰說，「凡事大家可以商量。結婚是大喜事，應該高興才是。不管怎麼樣，以後他倆孝順就行了。」

在其他深入交流中，筆者也頻繁遭遇不同家鄉人訴說的婚姻不幸、代際矛盾、子女不孝、生意失敗、意外事故、疾病纏身、痛失親人和晚年孤獨等人生經歷和家庭問題。他們在講述自己的艱辛故事時也希望獲得更多的理解、同情、安慰與支持。所以，筆者要從雙方共同的生活背景出發，設身處地體會他們的生存境遇，有時既感同身受又頗為無力，甚至無法推進正常談話節奏。此時，筆者會主動停下，從一個親屬、友人或鄉鄰的角度出發，在符合他們思維習慣和心理預期的本地話語和行為中表明理解和同情，給予他們心理安慰和支持鼓勵，希望他們相信社會在進步，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在完善，生活也會越來越好，或者提出一些力所能及的建議和辦法，實在無法應對時乾脆沉默一會，等大家情緒緩解之後再考慮是繼續還是轉向其他輕鬆有趣的話題。

過於親近的關係和深入的交流還牽扯更多倫理義務和利益訴求，且時常與角色身份、權力地位和人情面子等因素交織。這可以展開為兩方面：有些家鄉人將自己定位成對筆者富有道德責任的長輩，從過來人角度關心並指導我的工作生活和終身大事，更深地介入我的生活和學術。比如，參加當地的婚禮儀式時，筆者總會遭遇一些年長親友借喜事展開勸說：「找對象要趁年

輕，抓緊了。」「現在女孩的金貴，你不要要求太高，差不多就行了。你爺娘（父母）都著急了。」「和你一樣大的XX家二胎都滿月了，估計你爺娘盼抱孫子脖子都要盼長了。」為尊重他們的建議，避免尷尬和衝突，筆者會回應「您說的是，我會加倍努力。」同時透過視角轉換，筆者既思考自己的婚戀觀念和家庭主張，也回想其他文化，尤其是歐美社會的婚姻家庭模式，自覺將其與家鄉人的相應觀念對照，進一步理解雙方的共識與分歧。

也有些家鄉人將自己定位成筆者對其富有義務或要關照的對象，從一個學識、權力、身份和地位的弱者角度請求，甚至要求筆者幫忙解決他們當前面臨的一些生活困境，將筆者更深地拉入他們的生活世界。比如，他們時常為還在上學的孩子諮詢一些超出他們眼界又很想瞭解的學業和職業信息。「學文科還是理科有前途？」「現在什麼專業最好找工作？學什麼方便以後考公務員？」

「碩士（研究生）好不好考？畢業是不是比大學生好找工作？」「什麼階段出去留學最合適？」「博士是不是特別難考？好不好畢業？找工作應該很搶手吧？」……筆者會結合自身經歷，為他們提供新近情況和個人建議，同時強調我的經歷和認識的侷限性，以及要尊重孩子的想法和意願。還有家鄉人有更直接的利益訴求，希望筆者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社會影響幫忙解決一些棘手問題。比如，一位沒領到國家特色種植補償款的鄰居多次去村委會討要無果。他認為是村幹部私吞了補償款，轉而求助筆者。筆者憑藉與村幹部的熟識關係瞭解到，是鄰居申報太晚，錯過集體上交申請的時間，沒法單獨補辦，就請他們向鄰居耐心解釋，保證明年申報時提前通知他。

當然，當地人如何看待、定位並應對異鄉學者的角色、身份和關係的問題同樣存在。並且異鄉學者也會時常遭遇與他們的情感、倫理，尤其是權力和利益的糾葛，只是由於其在當地的角色身份相對簡單和外在，嵌入當地社會的關係網絡不深、範圍不廣，所以糾葛相對較少且簡單直接。與家鄉學者相比，其應對方式也有差別，更具靈活性和選擇性，可以在必要時果斷抽身。隨著交往時間拉長、程度加深、範圍擴大，異鄉學者要應對來自當地人的關係難題也會持續增加，呈現一種由外入內、由簡入繁、由淺入深的總體遭遇，直到田野工作全部完成、徹底離開才會使這些問題逐漸淡化，直至消失。這與一開始就身在其中且無法脫離的家鄉學者的田野處境和應對之法既

有一般相似，更有具體差異。總體來說，無論田野狀況如何變化，異鄉學者在當地都有比家鄉學者相對更多的行動自由與選擇餘地。

（五）當地人與研究者：個人特徵的交互影響

在與當地人的訪談和交流中，還要考慮個人的人格心理與社會文化特徵（比如脾氣、性格、年齡、輩分、學歷、職業、收入、性別、家庭狀況、政治面貌、宗教信仰等）的影響（Fassin and Bensa 2008；Lu and Hodge 2019；Rosaldo 1989），及其在研究者與當地人之間的匹配問題（Denzin and Lincoln 2017：102；Jahan 2014）。從社會或文化心理學角度說，個體的人格心理特徵並非單獨存在，而是與其社會文化特徵關係密切。兩者以Pierre Bourdieu所謂「慣習」（habitus）的方式融為一體，在具體的角色、身份和關係實踐中表現並重複。不過，即便共享當地文化，人們在上述特徵方面差異越多、分化越大，其融合方式也會愈複雜。全球化與地方化的交織導致當地人身上的「慣習」樣貌日趨多元、張力更大。這不僅給筆者與家鄉人的交流帶來更多困難、干擾和挑戰，也更易導致各類的誤解、分歧和衝突。

從脾氣和性格上說，有些家鄉人心直口快、善於表達，在認定筆者可以信任後之會直率地袒露關於自己、家人和親友的經歷和故事。年過花甲的新村村民阿章就曾向筆者坦承自己坎坷而勵志的人生經歷：幼年窮困、初中輟學、早早工作、艱難結婚、中年喪妻，爾後帶女兒入贅新村重建家庭，為自己在村裡立足，女兒出嫁，繼子娶妻，孫子孫女進城讀書，在城裡買房持續奮鬥。筆者性格外向、脾氣溫和、說話真誠、頗有耐心，也容易與這類被訪者深入交流，獲得豐富有效的信息資料，並且回訪沒有談論充分的話題。有些家鄉人小心謹慎、考慮周密、說話含蓄，或性格內向、膽小羞怯、不善言辭，導致其無法提供多少細緻、確切的信息資料。前者是有意為之，即便你再三詢問也得不到正面答覆。其中除了不太熟悉的家鄉人，也不乏一些關係很近的親友、鄰里。大舅和舅媽就設法回避自家的婚禮開支和禮單記錄問題。後者是性格能力所致。西村村民小波就因口吃說不清自家情況。這方面的阻力導致筆者想要深入交流十分困難，能從他們身上獲取的有效信息很少，所以除特殊需要外，後續不會與他們交流更多。還有些家鄉人（尤其是

男性）喜歡吹牛顯擺，看似對當地生活很有發言權，但其內容大都被誇大或扭曲，沒有太多可信度。山村村民阿奎講述2016年為兒娶親時買了一棟300多萬（人民幣）的別墅、一輛50多萬的寶馬（BMW）轎車，給女方彩禮50萬，還花100多萬在當地有名的HZ大酒店辦了一場新式婚禮，擺了100多桌酒席。但熟悉其為人和家庭的村民提醒我說，阿奎的話最多只能信一半。因此，雖然筆者能和此類被訪者充分交流，也能從他們身上獲得各種信息，但是要將其所述與其他被訪者的敘述比照、核實。

年齡和輩分的影響正在淡化，但依然體現在一些關係親近、義務強烈的長輩（親友）身上。在談論家庭生活和人生規劃時，他們常常從長者角度出發，或為我「設計」最佳職業路線，或在婚戀問題上「教育」我一番。甚至有長輩通過熟人關係為我聯繫本地對口的政府機關，或物色他們認為合適的相親對象。即便筆者對此種「從自身觀點出發為你好」的想法和做法感到不適，還是會表示感謝並策略性婉拒（強調自己有工作方向和戀愛對象），以免陷入過深、顛倒主次，吞噬自己的訪問目的和研究計畫。相比之下，年齡和輩分引發的長輩權威和倫理義務在同輩群體之間的影響要小得多，儘管學歷差距的影響依然存在。另外，在面對更年輕的晚輩時，傳統文化賦予的長輩權威疊加博士學歷的刻板印象，通過在場大人的施壓，以一種異常尊敬乃至仰望的方式出現，造成筆者與他們的更大距離和溝通難題。這提醒筆者想要削弱學歷背景和長輩權威的潛在影響，必須設法繞開家中大人，以更加平易近人的方式融入年輕的晚輩群體之中。

就學歷、職業和收入的影響來說，和高中以上學歷且在大中企業、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或辦廠做生意的家鄉人交流，他／她能迅速理解筆者的調查意圖和討論議題，清晰講述自己及周圍人的經歷和故事，適當表達自己的感受和看法，因此更易與之展開平等、深入的交流探討。比如，留學美國的阿軍、在渣土辦工作的阿炎等，都能迅速領會筆者的核心關注點並給出自己的思考和觀點。他們收入較高，更自信和健談，也要筆者給予更多肯定以示尊重。而那些學歷和收入水準較低、在民營企業工作的家鄉人常常不敢直視筆者，要筆者拉低身份，給予更多鼓勵以促進交流。特別是小學文化程度以下、單純在家務農的中老年人（女性），他們總是想到哪說到哪，從一

件事跳到另一件，從一個人轉到另一個，還不時摻雜自己的主觀情緒和道德判斷，因此要筆者儘量克服學歷、職業、年齡和輩分等差距，耐心傾聽、詢問、判別和確認，但依然難以和前述那些家鄉人一樣展開平等對話。比如，沒念過書的小外婆無法完整敘述自家的代際關係狀況，筆者只能以「拉家常」的方式引導她講述家裡這些年發生的事情，細心詢問子輩、孫輩待她如何？她又如何對待他們？

就性別差異來說，多數女性被訪者更具耐心、更願分享，講述的人物和故事也更細膩和生動；多數男性被訪者更具邏輯性和概括性，但也更易不耐煩、不願過多澄清。因此，筆者要通過自身性格特徵及在當地的角色身份和熟人關係優勢，來克服性別層面的交流障礙。面對「話癆式」的女性，筆者會認真傾聽並抓取關鍵信息；面對「提綱挈領式」的男性，筆者會注重形成整體經驗意識。就家庭狀況來說，家庭殘缺的被訪者要比家庭健全的被訪者更脆弱、敏感、謹慎和寡言，不輕易分享自己的家庭往事和艱辛生活，需要單獨、私密的交流空間，以及更多的理解、信任、同情和支持。因此，筆者會小心翼翼地訪問單親家庭的高中老同學勝哥，生怕提起某些過往而給他造成額外的心理負擔。

就政治面貌來說，一些（中國共產黨）黨員或幹部背景的家鄉人會流露充滿政治正確的價值立場，提醒筆者的研究必須提高「思想覺悟」、迴避「反動言論」。面對此類被訪者，除了察言觀色、謹慎說話，避免價值衝突並禮貌致謝外，筆者也會通過他們的敘述，理解官方意識形態如何塑造當地的禮俗生活和家庭關係，對比反思自己和他們的觀念差異。另外需要留心當地宗教信仰的影響。一些中老年人在談及戀愛婚姻、讀書考試、生兒育女、升官發財和長命百歲等話題時，總離不開XX菩薩或神仙保佑，還邀請筆者在初一、十五等農曆固定時節到附近寺廟燒香拜佛、許願還願。筆者一邊表示記下時間，一邊開始思考這些民間佛道觀念如何與傳統儒家倫理結合，持續影響當地人的家庭生活和禮俗安排，同時意識到自己和他們的不同理解方式。

轉到研究者的角度看，筆者要充分考慮自身的人格心理與社會特徵，以及不同家鄉人對筆者這些特徵的認知和定位對整個田野訪問過程的共同影響，儘量在雙方之間尋求更多關聯和匹配，拉近距離、推進訪談。具體而

言，筆者在交談時要儘量結合共享的文化背景、生活經驗，及過去對被訪者及其家庭的瞭解，密切留意對方的神情、動作、姿態和口吻，綜合判斷其性格特徵、社會背景和談話態度，以及提供的經驗資料的品質，然後決定是否深入或回訪。家鄉學者如果能將自己與家鄉人的個性特徵、社會背景、角色身份和關係網絡更好地關聯匹配，就有更多機會促進雙方深入交流，甄別對方提供的信息資料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在與被訪者的交互影響方面，家鄉與異鄉學者面臨的問題存在相當共性。差別在於，家鄉學者既可將這些個人特徵與身為當地人的角色、身份和關係整合起來，擴大交流優勢，也易因此深陷與當地人的現實糾葛；而沒有本地的角色身份、關係網絡、方言系統和倫理體系等的複雜影響和深層羈絆的異鄉學者，雖然與當地人的背景差異更大，但是這種距離感和外部性導致其反思和迴旋的餘地更大，自身的個人特徵和溝通能力也能更自由地施展開來。

總之，在促成研究者與當地人的深入交流和相互理解方面，反思研究者的個人特徵的影響同樣重要。不僅如此，雙方的個人特徵在交流與談話過程中相互影響，且關聯彼此及其家庭親友網絡的角色、身份和關係定位，內在牽涉情感、信任、利益、權力、地位、倫理等各種因素，還將外部更大的社會結構、文化體系甚至學術場域的影響帶入。因此，在反思異鄉，特別是家鄉研究的田野訪問過程時，須採取「以研究者的複雜和變化應對當地人的複雜和變化」的總體方法論路徑。這種反思路徑既促進筆者對自己的人格心理、社會特徵和思想觀念，及其與不同家鄉人的相應背景的異同情況和匹配程度有更深理解和把握，也對彼此的角色、身份和關係，及其內部相關影響因素、外部社會文化結構和學術知識場域的影響有更多的認識和比較。

四、文化距離與文化身份：進一步的思考與討論

（一）再思文化近距離的田野意義與局限

在全球化時代，研究者與當地人的文化距離更多表現為觀念與心理上的差異程度，而不是地理與歷史上的遙遠程度。就起點來說，家鄉學者雖比異鄉學者相對當地人的文化與生活的距離更近，但也存在相當差距，且同樣面

臨如何深入和溝通的難題。他們在當地的文化身份、與當地人的互動關係複雜多變，在進入方式、角色身份、關係處理、訪問策略、溝通技巧、理解詮釋和個人特徵等方面遭遇了諸多的困境和挑戰，而近距離的位置和局內人的身份並不能賦予他們無所不知的能力（張少強、古學斌 2006），反而可能會引起更大的不適和不安（Hume and Mulcock 2004 : xxii）。因此，其中涉及的方法論問題的關鍵不是抽象地將自己固定在「當地人」的角色身份和關係位置，及其先天優勢上不放，而是在情境化的角色關係與交流互動中，將學術與生活、研究者與當地人、異鄉與家鄉、自我與他者、局內與局外、主位與客位、觀察與參與、情感與理性等研究立場彼此貫通並靈活轉換，利用不同的角色、身份、關係和立場在理解、溝通和反思層面的不同特點，發揮相應優勢，避免其中劣勢。

從筆者的田野工作經歷看，浙北農民的禮俗生活與人情實踐既是我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議題，也是我的田野觀察和訪問策略的重要組成。因此，筆者既把（身為當地人的）自己作為方法（Xiang and Wu 2022），也把家鄉的生活經驗和熟人關係作為交流媒介（Collins and Gallinat 2010 ; Voloder 2008），認真理解並遵循當地的禮俗習慣和交往法則，既「通過人情訪問和理解人情」，也「通過人情研究和解釋人情」。所以，此種調查經歷同樣構成筆者在家鄉的禮俗生活與人情交往的特殊部分。這種學術和生活的高度融合造成的田野複雜性，不僅給筆者帶來諸多便利和優勢，也催生很多問題和困擾。一些海外家鄉人類學家已經為這些方法困境感到焦慮（Hume and Mulcock 2004 ; Chavez 2008 ; Jahan 2014）。筆者力圖將實踐和反思貫穿並統一於整個家鄉研究的田野過程，在兩者之間調適與轉換，對照與監督、協調與處理一些突發狀況，儘量達成學術與生活的良性互動與動態平衡（雖然遺憾和失誤在所難免）。

從近距離的田野參與和日常交往看，筆者最鮮明的感受是「生活即田野、田野即生活」。生活和田野之間「不再有清晰的界限」（郭佩宜、王宏仁 2006 : 312）。家鄉的田野調查也具備了學術和生活的雙重意義。它既是一種深受當地倫理約束的社會交往方式，也是一種信息、資源或利益的社會交換方式，還是一種複雜、多元的情感交流方式。身為家鄉學者的筆者，既是研

究者的一員，又是當地人的一員，所以要比異鄉學者更注意遵循當地以「禮義」為核心的倫理交往法則的主導地位，兼顧以「互惠」為核心的利益交換法則和以「真誠」為核心的情感交流法則的內在要求。或許外來學者在交往上不懂規矩或無知犯錯會得到當地人諒解，但是家鄉學者會因此失信於人，甚至遭到家鄉人的集體控訴和懲罰，所以要「比社區中的其他任何人表現地完美」

（Kanaaneh 1997：14）。另外，筆者也要更謹慎、細緻地在自己與家鄉人的各種角色、身份和關係，及其捲入的相關因素之間尋求恰當的連接點和平衡點。這些因素的遭遇、匯集和碰撞，既加劇了筆者的困擾和挑戰，也激發了筆者的思考和洞見。

如果不顧及與自己在家鄉的角色、身份和關係相符的倫理與禮俗要求，會導致被訪者認為筆者沒有教養、讀了博士就自以為不起，引起他們的表面附和與內心拒斥；如果不重視雙方互動關係中的各種利益考量與權力因素，以及彼此對對方的角色、關係與身份定位的微妙影響，會導致研究者把訪問過程看得太簡單和諧，無法把握當地人故事背後的言外之意、價值觀念、利益訴求和等級意識；如果處理不好情感和信任因素，交談過程太嚴肅和正式，會讓被訪者產生距離感、疑慮感和厭惡感，覺得筆者是在裝腔作勢，無從開口或不願溝通，而太過熱情和投入又會使被訪者對筆者過度信任、情感氾濫，難以正常開展深入交流。這些影響因素既關聯雙方的人格心理與社會文化特徵等個人層面，也關聯浙北鄉村甚至中國／華人／漢人社會文化的整體層面。總之，關係、信任、人情、面子、禮儀、權威、身份、地位、情感等受中國傳統文化塑造的因素貫穿整個田野過程，深刻影響筆者與家鄉人的交流互動和相互理解。一些學者探討了其中若干因素的田野影響（潘年英 2001；Cui 2015；He 2021；Heimer and Thøgersen 2006；Sin and Yang 2020；Zhao 2017），表明其對田野調查的一般影響的同時，也凸顯中國文化對家鄉學者的田野實踐的特殊影響，只是尚未系統深入下去。

學術與生活的高度融合導致家鄉學者比異鄉學者遭受更多來自當地社會的內在約束，其交往過程也更富於挑戰，因此要更慎重地面對上述因素的影響，也要設法拉開文化距離，從各種「他者」角度對「自我」保持反思（Kim 1990；Ohnuki-Tierney 1984）。為此，筆者也會自覺調用自己積累的

「他者」眼光，²反觀、監控並約束「自我」的多重實踐內涵（主要是來自家鄉生活的經驗、感受和觀念），使之既能發揮優勢，又不過度膨脹，迷失在家鄉人（包括自己）的情緒情感及帶有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的經驗敘述之中，遮蔽研究者的外部觀察、理性思考和比較意識，以此揭示「我」（家鄉學者）與「我們」（家鄉人）的異同的複雜性和變化性。可見，家鄉學者處於文化連接地帶並在兩邊來回穿梭，既得益也受困於自己的雙邊角色及其轉換過程，既要扮演好各種「自我」，也要利用好各種「他者」，力圖通過學術與文化的雙重實踐將兩邊協調起來，實現不同角色和立場的優勢互鑒。

事有兩面、利弊相生。家鄉與異鄉學者的田野處境既有相似，也有不同，各有優勢與侷限（Ohnuki-Tierney 1984）。優勢方面，共享的社會文化背景弱化了他者與自我、異鄉人與家鄉人、局外人與局內人、研究者與當地人等角色身份區分，有利於家鄉學者打通邊界、實現轉換，順利進入田野、適應環境，與當地人展開多元交流，理解其意義世界。但是，家鄉學者直接把自己等同於當地人，認為這就能深入當地文化的核心地帶，而異鄉學者終難成為當地人，所以只能徘徊在邊緣地帶，恐怕言過其實。因為不僅家鄉學者與家鄉人之間存在相當差異，因而前者無法「代言」後者，而且異鄉學者在克服文化距離、深入當地社會方面也存在自身的專業能力和外部優勢，只是相對家鄉學者來說，其面臨的來自當地的表層阻礙和困難更多一些。侷限方面，家鄉學者和當地人的文化距離更近、社會關係更親密，在當地的角色身份與關係網絡盤根錯節，更易引發倫理、權力、利益、信任、情感等的深層糾葛，進而對田野訪問產生更多負面影響。與此同時，認為異鄉學者天然擁有「他者」視野以及看清異文化和本文化的比較優勢，而家鄉學者始終難以擺脫「自我」、形成「他者」眼光來比較異文化、看清本文化，同樣太過武斷。因為近距離的田野處境和家鄉人的文化身份雖有諸多不利，但家鄉學者也能通過學術訓練和異文化經驗在「自我」中引入「他者」眼光進行彌

2 其主要來自筆者常年在外地大城市的求學經歷、生活經驗和學術訓練（包括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專業知識儲備和對其他文化特別是西方文明的深入瞭解和實際接觸），以及由此產生的多元理解和自身改變。

補，而異鄉學者的「他者」優勢同樣受自身人格、文化體系與學術場域的多重認識遮蔽（潘英海 1997；Okely 1996；Rosaldo 1989）。只是個性、文化與學術背景的前期負載使家鄉研究的田野處境比異鄉研究更加複雜，對其在矛盾處理、關係協調、自我反思和文化比較等方面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總而言之，家鄉學者在家鄉做田野研究面臨的整體後果是「合則兩利、分則兩敗」：如果處理得當，不僅會得到家鄉人的更多理解、支持和幫助，獲取更豐富深入的田野資料，也能更多盡到自己身為家鄉人的倫理義務，加強與親友、鄰里和熟人的感情關係；如果處理不當，非但得不到充分有效的訪談信息，還會遭到家鄉人的集體拒斥，陷入學術與生活的雙重尷尬境地。因為筆者在家鄉的角色、身份和關係都是長期和強制的，既難以徹底剝離，也無法真正割捨，還要持續投入（Ntarangwi, Mills, and Babiker 2006：262）。所以，一旦選擇家鄉（尤其在中國大陸、臺灣、香港和其他華人社會）做研究就沒有退出機制，而且要考慮好長遠付出並承受學術與生活的雙重代價的準備。如果因為操作不當造成一些當地關係受損破裂（Dyck 2000），那筆者將面臨「沒臉回家卻不得不回」的兩難處境。我的「惡名」會在當地鄉野擴散，後續的回訪與追蹤研究也不太可能，甚至還會累及幫助筆者展開田野調查的父母與至親的生活與交往。他們也需要花費更多時間和精力去彌補並修復那些因為調查而遭受負面影響的親友、鄰里和熟人關係網絡。

相對來說，異鄉學者不必太擔心上述這些方面的倫理問題及其社會後果。即便調查沒那麼成功，和當地人的相處沒那麼友好（Hume and Mulcock 2004；Fassin and Bensa 2008），離場時沒那麼依依不捨，他們以後的重訪也不會和家鄉學者一樣必須和頻繁，甚至在某處調查失敗以後也可以果斷放棄、迅速離開，另選別處重新開始。關鍵差別在於，其與當地人的關係和交往始終建立在短期和自由的基礎之上，沒有當地的文化、政治和倫理對家鄉學者要求的強制義務。這不是要排除少數異鄉學者與某些關鍵報導人之間發展出長久友誼的可能，而是力圖指出以論著生產和學術交流為重，希望在自己社會的主流學界和文化體系中獲得承認，始終是他們的田野工作的起點和歸宿。而田野生活和私人友誼更多只是工作倫理要求和學術附帶產物。這點在家鄉學者那裡相當不同。對其而言，即便不是生活意義高於學術承認，至

少也是同樣重要。此外，家鄉研究還負載了本地社會更高的文化認同要求和學術創新期待（林徐達 2011）。

因此，家鄉學者在田野成功時，會在學術目標之外收穫更多源自當地的生活意義，在田野失敗時，會在學術損失之外承擔更多源自當地的生活代價。這成為家鄉與本土取向的田野研究對研究者的獨特意義和巨大挑戰。為此，在田野工作過程中，他們不僅要更謹慎、系統地反思和應對研究者與當地人之間複雜、親密的互動關係，也要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和把握兩者之間的文化距離（遠近）和文化身份（異同）的意義與侷限。

（二）從田野現場伸向學術場域的深層檢視

與反思田野工作困境密切相關的問題是檢視研究者所在學術—文化場域的運行邏輯及其內在侷限，因為田野工作和民族誌的生產—傳播過程也受到該場域內部「遊戲法則」的深層控制。由於研究者大都十分注重「寫給誰看」的問題，所以田野研究的最終成果首要是回歸自身學術—文化領域，通過公開出版和作品報告，接受同行讀者的閱讀、理解、批判、對話、承認、詮釋和重釋，而非直接回饋當地人。多數學者先對準本地學術—文化場域中的讀者，後散佈到其他場域。這導致他們的論著書寫（從經驗表述到理論思考）和出版講授的主題、風格和內容既易受到本土學術—文化的主流取向、理論偏好和語言體系的影響，也易受到本土社會的主導（民族）視野、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的塑造。

將論著生產—傳播過程納入世界學術—文化權力體系以後，問題就更複雜了。大部分西方和非西方的家鄉學者在其中處於相對邊緣的位置。他們要面對佔據優勢位置的異鄉學者和西方人類學的學術主流。當兩者關注共同的研究對象和議題時就會成為競爭對手，在全世界延續知識／話語—權力的壓迫與反抗鬥爭（桑山敬己 2019；Smith 2021）。在全球現代化背景下，這種權力等級格局不僅存在於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也存在於南北兩大體系內部，甚至存在於各個民族國家內部，短期內很難扭轉。這長期干擾、阻撓家鄉與異鄉、本土與異域的學術群體與學術場域之間平等、自由的交流對話。此外，一些家鄉或本土學者通過各自的話語體系和學術濾鏡，將各種文

化的差異、分歧和矛盾本質化、種族化、殖民化和政治化，導致各方的誤解和敵意加深，由此成為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和價值衝突的學術幫兇，而不是跨文化交流的學術使者（Kjellgren 2003；Motzafi-Haller 1997）。

這種中心和邊遠、霸權與反抗的權力格局也涉及學者的情感、權力、利益、身份、地位和倫理等因素的重重影響。就中國大陸的人類學與社會學發展脈絡而言，從凸顯西方優勢到強調本土特色，這些主張都可能成為本土學者混跡本地學術場域、塑造自身學術形象的知識資本或學術修辭。他們處在西方與本土之間，或借用西方現代學術知識，或拉來中國傳統學術資源，強化自身相對普通人的學術專家地位，以及相對西方學者的本土知識優勢。如果對其實踐邏輯和優勢方面不加反思，恐怕既無法克服研究者與當地人的不平等關係，也無法促進家鄉與異鄉學者的平等交流，反而會因為自己在本地學術—文化場域中的特定位置、情感歸屬和身份認同，以及權力、利益、身份、地位的競爭需要，而製造諸多封閉的學術利益圈子，擴大並固化圈內與圈外、家鄉與異鄉的二元對立格局。也即，家鄉學者如果忽視或回避自身所處學術—文化場域的結構與運行情況，以及諸多背景因素對知識生產和學術交流的影響，由此失卻對其內在過程的反思批判和自律自覺，那麼無論是強調西方化還是本土化的研究路徑，都可能變成其為達成工具、功利或實用主義的學術目標而選擇的不同話語策略。其中「有的只是利用既有的知識霸權對社會發展方向的支配，並極力將自己的一套知識體系強加到日常生活的規則上去」（趙旭東 2003：243-244）。這種類似學術捐客的做法，與人類學與社會學追求的學術自由與學術批判的最終理想背道而馳。

但是，在論著寫作和報告交流中，自我反思是複雜且困難的。因為身為思考、表述、書寫、彙報和論辯主體的研究者相對當地人的知識—社會優勢位置，很難被各類行動主體（研究者、當地人、學術同行、及其他讀者）的「多元聲音」的相遇和對話輕易拉平。主張人類學家要帶著他的田野合作者給內行聽眾作報告這樣的「合作式」的人類學（Boyer and Marcus 2020）也難以完全實現。畢竟研究者的學術場域與當地人的生活世界重心有別。前者更關心如何在特定學術領域研究並呈現某些社會文化「真相」，由此實現學術人的使命和意義，後者更關心如何在特定社會文化環境中更好地適應和生

活。即便研究者願意且有能力邀請他們進入象牙塔參與學術交流，除了偶爾為之外，多數人不太可能，也不太願意放下日常工作，頻繁參與研究者視如珍寶的田野分享和學術討論。他們更關心自己如何（更好地）生活，研究者對解決他們的現實困境有何幫助，而對學術研究本身興趣有限。就此來說，想讓這些行動主體共同在場，建立平等、多元的對話關係其實相當困難，需要他們通力合作並達成共識，克服學術、語言、文化與生活領域的多重阻隔。在交通運輸和互聯網高度發達的今天，人類學家想邀請當地人登上學術殿堂依然不易，想藉此消除各種面目的「學者中心論」和「我族中心論」更是異常困難。再者說來，當地人不是一個同質的總體，當地文化也充滿張力和變化。若研究者僅僅邀請若干關鍵報導人或田野合作者前來交流發聲，既沒那麼合情合理，也沒那麼理直氣壯。

此外，研究者相對當地人的優勢位置也受到學術場域內部的取向、規範、關係、身份、位置、權力和利益格局的深層影響，而其遊戲規則有著深厚的等級圈層結構和路徑依賴傾向。依託主流學術評價邏輯，人類學和社會學對特定社會經驗領域進行連接、攀附、操弄和解釋，以完成專業知識的生產和轉換。無論是經典民族誌宣稱的「我親自所去、親眼所見、親耳所聽、親筆所記」，還是後現代民族誌主張的「請當地人一起來這裡，與作者和讀者共同對話」，都表明研究者想以不同方式實現「這裡」與「那裡」的連接。個人很難擺脫這種田野—知識生產過程的結構性影響。在其中，研究者相對研究對象的優勢地位與相對學術同行（特別是權威學者）的劣勢地位彼此交織。一些急於完成學術成人禮並希望在學界獲得一席之地的年輕學者，更會以各種科學話語或人文修辭對當地人的經驗世界進行學術裝扮，以便迎合所處學術場域的主流興趣、品味、取向和規範，使其看上去紮實生動、更具說服力，然後順利融入學術圈子，獲得體制承認，開啟學術生涯。這些影響因素會在學術場內部的中心位置不斷聚集，形成一個充滿魔力和誘惑的巨大吸盤，驅使一代代年輕學人投身其中，又把非主流的學術取向、當地人，以及其他專業或普通讀者置於次要位置，儘管這或許並非其內心所願。最終，這種運行邏輯強化了論著生產、學術交流和知識傳播過程中的內外不平等，以及學術圈內部的權力、利益、聲望和關係資源的排他性追逐，甚至造

成「牆內開花牆外香」的意外結果。一些不合主流的研究成果在本學科領域內長期得不到同行認可，卻在其他學科領域或普通讀者中間廣為流傳。

總之，從田野經歷到學術殿堂，學術偏好、文化背景、語言體系、意識形態、價值歸屬、情感認同，以及規範、關係、身份、位置、權力、聲望、利益等諸多推手，企圖在學術—文化場域運行中製造各種不平等，但研究者不能因其頑固強勢而任其擴大，侵蝕甚至控制學術對話與文化交流的自由空間。遺憾的是，後現代主義者對田野—學術生產過程的文本敘事與寫作過程的學術反思多是脫離田野實際的空頭論辯，始終跳不出原有學術—文化體系的二元對立與權力等級困局。只有將田野實踐與論著書寫、學術交流的全過程相結合，並進行徹底的方法論反思，才是明智之舉。在這個整體反思過程中，研究者不僅要警惕田野與學術場域中規範的僵化、權力的傲慢、地位的束縛、利益的誘惑、情感的沉溺、關係的困擾、價值的替代、政治的控制、語言的侷限、方法的困境和理論的遮蔽，也歡迎更多行動主體的參與、講述、補充、對話、批判和更新。這就要求研究者形成徹底的反思決心和自律能力，直面自我的個性特徵、文化背景與學術處境中的各種優勢與侷限。

（三）文化身份的整體定位、反思與超越

整體來看，研究者與當地人的文化距離與文化身份，對人類學與社會學家的學術研究影響究竟如何？日本學者末成道男（1993）指出，家鄉人類學的意義「在於反省性探索（自身與其他的關係）：它能更清楚地反映出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之間的關係。距離的含義會更加明確」。更詳細地說，以本文化和家鄉人為參照，其中包含一張有關研究者與當地人及當地文化（包括其中的學術場域）的不同距離的身份光譜：一端是作為「他者」或「他們」的異鄉人與異文化，另一端是作為「自我」或「我們」的家鄉人和本文化。其整體結構可以展開為「（異文化）異鄉人—異鄉學者—跨文化群體（跨文化學者）—家鄉學者—家鄉人（本文化）」的文化身份分佈序列。

從文化距離角度說，家鄉人與本文化最近，而接觸更多外部文化與學術訓練的家鄉學者距離本文化稍遠；異鄉人與異文化（即異鄉人的家鄉文化）最近，異鄉學者與異文化距離稍遠；中間的跨文化群體特別是跨文化學者長

期來回於不同文化體系及其學術場域之間，因此與兩邊既關係密切，又保持距離。從文化身份角度說，每個開啟田野研究的學者在這個身份光譜中都有一個初始位置。這個位置依據研究者與特定文化體系與學術場域的距離而定，具有某種先在性。比如，傳統取向的人類學家會將自己優先定位成異鄉學者，在本文化中接受學術訓練，再到異國他鄉展開田野調查，最後重點回到本文化，用母語書寫民族誌並與本地同行進行學術交流；家鄉學者則將學術訓練、田野調查、論著書寫和學術交流的對象優先錨定在本土（特別是國內）社會、家鄉人和本地同行之間。

全球高速流動的今天，這種文化身份區分框架已日益被打破。不僅異鄉和家鄉學者的內部構成和交流方式更多元化，也有更多在兩種及以上文化體系中生活，又在其中做田野調查並切換不同語言進行學術交流的跨文化學者。且學者的既有文化距離與位置結構並非不可改變，而是能憑藉自己的方法反思和田野實踐不斷做出調整。田野調查和論著書寫因此成為人類學和社會學家穿透各種社會文化體系、促成與各色當地人交流的學術—文化實踐。它要求學者情境化地定位、連接自身的角色身份以及與當地人的關係，「在與人類學家希望表達的人群和問題的關係之間變換身份」（Clifford 1997：80-81）。將中西學術—文化背景帶入來看，西方學者處在靠近西方人（對照西方學術—文化體系）一端，跨文化學者處於中間，中國學者處在靠近中國人（對照中國學術—文化體系）一端。儘管憑藉社會流動和專業素養能調整文化距離、文化身份和研究立場，但是不同的初始位置還是深刻影響了研究者與當地人後續的角色關係定位和社會交往過程，進而引發一系列方向和重點不太相同的現實困境和應對策略。

西方（異鄉）學者的核心困境源於西方的主流文化和學術傳統的內在遮蔽，與當地人的文化距離過遠、關係過生、交流困難，因此即便他們不試圖成為當地人，也希望引入主位立場，實現當地化的認識轉換，親近並理解其日常生活的意義世界；中國（家鄉）學者的核心困境源於中國的主流文化和學術傳統的內在遮蔽，與當地人的文化距離過近、關係過熟，各種因素捲入過深，因此即便不能完全跳脫成為局外人，也希望引入客位立場，實現他者化的認識轉換，拉開距離並重新定位、理解和反思本地文化；跨文化學者

的核心困局更複雜，處理得當可以超越異鄉和家鄉學者的文化背景與學術傳統的雙重遮蔽，同時兼具兩者的各自優勢，處理不慎也可能同時面臨前面兩者的雙重遮蔽和雙重困境，在研究者及當地人之間引發更多誤解和矛盾。總之，在日趨多元但仍以英美等西方國家為核心的世界學術—文化權力體系中，家鄉、異鄉，特別是跨文化學者不僅有更多開啟平等、雙向的文化比較和學術交流的機會，也有更多雙向傳輸西方主流學術傳統、鞏固中心甚至次中心或半邊緣地帶的學術—文化霸權的風險。

回到一般方法論層面來看，異鄉和家鄉研究的核心問題首要都是「研究者如何在與當地人及其社會文化的互動關係和異同比較中定位、認識和反思『自我』和『我們』」。異鄉學者希望通過認識「他者」和「他們」，進而理解「自我」和「我們」，在與異文化的遠距離關係中看清自身；家鄉學者希望通過認識「自我」和「我們」理解自身，在與本文化的近距離關係中明確自身。進一步說，異鄉學者自帶「他者」眼光，既能以「自我」認識「他者」，也能以「他者」反觀「自我」。家鄉學者則需要從外部引入「他者」眼光來比照和反思「自我」。因為在研究者與當地人的相似背景和親密關係中，「他者」的位置和角色常常容易被遮蓋，無法像在異鄉研究中那樣凸顯。但是，被「他者」照亮的「自我」本身也能成為理解其他異文化的「他者」眼光。所以，家鄉研究的意義同樣「在於使『彼此』之間有可能相互參照、相互啟發，而不在於反復強調此處的意義」（王銘銘 2008a：76）。

進一步說，以「自我」為中心，家鄉研究中隱藏的「他者」指向不同的「異鄉」社會，其中包含「向內」和「向外」兩種視野。從內部看：以現在為起點，將本地（中國）歷史傳統他者化；或以主體民族（漢族）為起點，將本國少數民族他者化；或以中原（儒家）文化為起點，將邊緣地區的文化他者化。這種做法既可以推進對（中華）文化體系內部的複雜性，特別是差異性的理解與解釋，也可能成為「次中心」的製造者，由此矮化內部其他各種「他者」，因此要警惕漢族主義、中原地區和儒家學術—文化的地位優勢對少數民族、邊陲地區和其他邊緣文化的二次遮蔽和解釋霸權，輕視後者的獨特性、主體性，及其對於理解和反觀前者的主流文化、乃至整個中國文化體系的複雜性和多元性的價值。總而言之，面對中國／華人／漢人社會的家

鄉與本土研究，既不能高估從中心看待邊緣和世界的事實性和價值性，也要提升從邊緣看待中心和世界的可能性與豐富性，更要增進不同身份、立場和看法之間的交流、互照與反思，認清「自我」與「他者」的邊界、聯繫與異同，避免位置優劣造成的視野侷限、等級意識和文化偏見。

從外部看，中國與西方（及其他非西方文化）互為他者，只是在中國做田野時西方學者自帶「他者」的文化與學術背景，中國學者則要借鑒外部（主要指向西方）的文化與學術體系作為比照前提。這就涉及對不同學術—文化體系之間的權力格局的深層反思。西方學者最需警惕隱藏在研究者與當地人的遠距離的角色、身份和交往關係背後的「西方中心論」、文化種族主義和學術—文化霸權。這方面的批評廣泛存在於家鄉或本土研究及後殖民主義思潮中；中國學者最需警惕隱藏在研究者與當地人的近距離的角色、身份和交往關係背後的「中國中心論」與「學術自我殖民」的雙重傾向，以及捲入其中的本土主義或民族主義情感、意識形態取向和文化本質主義立場。這方面的反思更多來自臺灣、香港和海外華人學者及西方學者（林徐達 2011；項飆 2009；黃宗智 2005；Kjellgren 2003），中國大陸學者的內部檢討相對不足，還需拓展和深化（這成為本文的核心出發點）；對來回中西方或其他文化之間的跨文化學者來說，上述兩方面的問題和侷限都要警惕和克服。從早期的費孝通、許烺光到近期的項飆、丹增金巴等跨文化人類學家都有反思和警覺，但仍需更深層的揭示與檢討。

總之，全球化時代的自我與他者、我們與他們、家鄉與異鄉、本土與異域、這裡與那裡及此處與彼處，早已彙聚成為一個相對界定、相互影響的世界學術—文化體系。無論是異鄉還是家鄉研究，知彼與知己總是關聯在一起，互照互鑒：從研究路徑上說，異鄉研究是先借已知彼，再從「他者」的外部視角認識並反思自身，家鄉研究是先借彼知己，再從「自我」的內部視角認識並反思他者；從研究目標上說，異鄉研究既想彰顯文化之間的差異，也想借此實現異中求同的普遍理想，家鄉研究既想彰顯文化內部的共性，也想借此實現同中識異的特殊理想。而兩者的根本方法論問題都是研究者如何通過特定的學術訓練和田野實踐，擺脫各種社會文化體系（包括嵌入其中的個人特徵和學術場域）的內在束縛，深入觀察和理解時不沉溺於任何文化，

跳出反觀和比較時不偏袒任何文化，在開放包容、平等多元、交互綜合的理解、反思與比較框架中深入認識和把握兩個及以上社會文化體系的內外異同及其優勢與侷限。

可見，家鄉和異鄉研究雖然在具體路徑目標上有所差異，但是都指向「民族誌的本質及其用途的根本問題」（Kuper 1994：547）的最終答案，且家鄉與異鄉研究者都希望充當不同文化或群體之間的溝通媒介和交流使者，從各自的角度將內外邊界與異同目標打通，相互對話、批評、反思、合作與借鑒，共同促進家鄉內部、家鄉與異鄉，乃至全人類的自由、民主、多元、平等、公平、正義、尊重與和諧。為邁向一種既立足地方／本土，又面向全球／國際，既保持獨特性、多樣性，又尋求共同性、共通性的「世界人類學」（同上引；Ribeiro and Escobar 2006）、「主體人類學」（傲東白力格 2006；費孝通 2004）或「主體民族誌」（朱炳祥 2018）而不懈努力。

五、結論：邁向一條家鄉研究的自我反思之路

概括來說，家鄉研究未必有其學術群體聲稱的那麼多我者優勢，也未必有一些異鄉學者批評的那麼多內在侷限。反之，在異國他鄉做田野調查的人類學家同樣未必有其強調的那麼多他者優勢，也未必有一些家鄉學者批評的那麼多外在侷限。由於兩者和當地人的文化距離不同，文化身份定位也有差別，所以他們在上述方法論問題上既有相似，又有不同，可謂各有優勢和侷限。雙方的核心處境差異是家鄉學者在學術與生活上的高度融合及其引發、放大並複雜化的各種田野與學術問題。從文化特殊性的角度說，在浙北鄉村做田野調查，家鄉學者要比異鄉學者更充分地考慮到當地／中國／華人／漢人社會的角色、關係、信任、人情、面子、身份、地位、權威與倫理等因素的深度捲入，及其對田野研究和日常生活造成的雙重影響。如果處理得當，家鄉學者在收穫學術成果的同時能更好地鞏固家鄉的生活圈子；如果處理不慎，則會在學術與生活上造成更多的雙重遮蔽和雙重損害。

對照來看，當前人類學與社會學界有關家鄉與異鄉研究的優劣之爭，更多是有關田野方法的理想觀點，不是田野研究一定會遭遇的工作處境。在

實際操作中，這些方法論主張雖有參考價值，但既不穩固，也不絕對，更沒有普遍性和統一性，若理解過於簡化、抽象和極端還會產生干擾和誤導。其實，無論是趕去異鄉還是回到家鄉，研究者在進入田野現場，對當地人的生活進行參與、觀察、訪談、體驗、表述、理解、解釋、對話、反思時，都會遭遇各種現實難題。這些難題與研究者的文化距離與文化身份問題交織，其中的實踐複雜性遠非「家鄉還是異鄉學者」一項所能涵蓋。其解決的重點也不是兩者的身份優劣之爭，而是研究者的學術訓練、專業素養和人生經歷，以及對上述方法論問題的系統反思、實地把控和適時處理的經驗和能力（潘年英 2001；Tenzin 2022a）。為此，研究者想要順利展開田野工作，恰當理解和表述當地人的意義世界，以其經驗生命力激發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理論想像力，都要採取「以研究者的複雜和變化應對當地人的複雜和變化」的方法論路徑，既要入鄉隨俗，掌握當地人的語言、思維、行為與交往方式，同時調動自身主觀世界中多元的觀念、經歷與感受，發揮溝通、傾聽與共情的能力，理解當地人和當地文化的複雜與變化，也要注意分寸和尺度，同時反省自身的主觀經驗、文化背景與學術訓練造成的視野侷限與認識遮蔽，警惕角色、關係、信任、情感、利益、身份、地位、權力和倫理等內部因素對田野工作過程的負面影響。

就此而言，異鄉學者憑藉自身的學術訓練、專業素養和個人經驗，想融入並理解當地人的意義世界並非沒有可能。因為遠距離的文化身份與文化差異不僅會製造交流障礙，也能帶來外部優勢。而家鄉學者如果過於強調近距離的文化身份與本土方法論立場的合理性和權威性，以此貶低和排斥異鄉學者的異鄉研究，就容易將家鄉與異鄉、本土與異域的範疇區分置於本質化的二元對立境地。這種相互割裂並彼此對壘的方法論取向，既容易導致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和自我殖民等學術—政治問題趁虛而入，強化不同學術—文化體系之間的等級格局，也違背了開展田野工作、論著書寫和學術交流的根本意圖，無法應對人性與社會的實踐經驗的複雜面貌，還可能成為一些學者在本土學術場域中成就個人的名利、權威和地位，鞏固私人關係圈子的知識工具和學術修辭。它還會從自身角度強化爭辯雙方的自我遮蔽，既無法認識和反思自身的內在缺陷，也難以意識和吸取對方的內在優勢，進而將整個學術爭論引向一條形而上學的死

胡同，而不是置於一種具體、鮮活的田野場景和學術實踐之中。

進一步說，他者與自我、異鄉人與家鄉人、局外人與局內人、研究者與當地人等角色身份和研究立場，既彼此區分、相對界定，又彼此互通、相互轉換。它們之間充滿矛盾性與辯證性，沒有絕對的獨立性和存在性，因此需要被整體化、關聯化、過程化、情境化和實踐化地看待和運用。在任何操作良好、進展順利的田野研究中，研究者都能自覺來回於各種角色身份和研究立場之間，扮演跨界者、連接者、翻譯者和溝通者，而不是抱定某種身份和立場（的優勢與劣勢）不放。因為研究者希望在其中尋求聯繫、合作、依存和轉化，充當學術與生活、異鄉與家鄉的對話使者，平等、深入地理解並解釋各種文化的複雜關係與內涵異同。所以，無論家鄉還是異鄉學者，要重視的不是反復確認自己是不是當地人，或者一味模仿乃至成為當地人，更不是強調用本土學術話語為當地人代言，而是要妥善處理與當地人、學術同行，以及其他讀者的關係，促進不同文化的人群之間的相互理解和真誠對話，警惕權威、對抗固化、開放交流、理解異同、尊重差異、保持多樣、尋求共識、促成和諧。在這些核心目標上，異鄉／異域人類學與家鄉／本土人類學、家鄉／本土社會學之間存在根本共識。

總之，田野研究面臨「誰來做田野調查、書寫民族誌」，「為何、如何，以及在怎樣的學術—文化環境中調查、書寫與交流」等一般方法論問題，而研究者既要跨越田野與學術兩個實踐場域，又要受制於兩者的結構體系與運行方式，因此不僅要將實踐與反思的過程融合起來，也要將著作與生活、研究與做人的實踐捆成一團。其重點指向研究者的田野調查、論著書寫和學術交流的環境、過程、方法、目標與影響，特別指向對研究者與當地人、學術同行，及其他讀者組成的學術—文化生產場域的實踐邏輯的自我反思和內在警醒（張少強、古學斌 2006；Sangren 2007）。這種反思與實踐相統一的學術要求，是人類學、社會學，乃至所有社會科學都要直面的方法論議題，也是一種自我分析和自我超越相互融合的學術／知識—社會／文化實踐過程。

所以，家鄉研究引發的有關文化距離和文化身份對田野研究的影響檢討，最終都指向一種有關「自我」和「我們」的、徹底的人類學與社會學反

思，尤其指向對家鄉與本土學者的「自我」的內涵與實踐、優勢與侷限的理解與解釋、比較與反思、警覺與超越。相比異鄉研究來說，家鄉研究最大的危險就是研究者的「自我」中心性、特權性和優越感疊加，以及由此在個性、生活與學術層面形成的三重自我沉溺或自我遮蔽。而且，這種徹底的自我反思指向也符合現代人類學的初衷，只是其反思的對象範圍已經從特定社會文化中的「自我」與「我們」延伸到特定學術場域與學術群體中的「自我」與「我們」。

這就要求研究者「把自己作為方法」的同時「把方法對準自己」，在家鄉人、家鄉學者與異鄉人、異鄉學者，以及其他文化背景的讀者構成的學術—文化場域的運行過程中不斷思考「我是誰？」（包括研究者對自身角色身份的自我認知和情境定位，他人對研究者的角色身份的外部認知和定位變化，以及兩者的認知和定位的一致程度）、「我的優勢是什麼？侷限是什麼？」「我如何最大限度發揮自我優勢、克服自我侷限來完成田野調查及後續的論著書寫和學術交流工作？」它警示研究者，特別是家鄉學者要通過各種學術、文化和個性借鏡，在一種田野與學界、自我與他者、異鄉與家鄉互通、互動的「關係主義」框架中，靈活理解「自我」的內涵體系與實踐邏輯，形成相對清晰的自我認識和自我定位，以便獲得充分的自知之明和自我約束。其中包含兩大方面：從「自我」的內部看，作為本地人或家鄉人的社會位置和身份認同的複雜性、多面性、層級性、情境性和流動性，在家鄉或本土研究中可以構成相互對照、反思與批評的重要方法論路徑（Tenzin 2022a）；從「自我」與「他者」的關係角度看，自我認識的解放任務既關乎對「我已」的深度剖析，也關乎對「自我」與「他人」的關係揭示與異同比較（王銘銘 2023）。因此，這不僅是一個面向自我、突破自我的實踐與反思雙向互動的過程，也是一種「由內而外」地理解各色他人／他者、實現深入交流的方法論路徑。

生活不止，田野無盡。家鄉與本土研究的實踐與反思之路自然也沒有終點。這註定是一段漫長且艱辛的學術旅程。因為相比「他者」和「他們」而言，戴在「自我」與「我們」身上的這些習以為常的學術—文化鑛鏹更繁複、沉重，所以把批評、反思和超越的目標對準「自我」與「我們」遠比對準「他者」和「他們」更困難、更有阻力，也更需要勇氣、毅力和突破精

神。對於深受關係、信任、人情、面子、身份、地位、權威和利益因素，以及傳統倫理、意識形態、民族認同、國家復興等羈絆的中國／華人／漢人社會的學者群和學術圈來說尤為如此。

參考書目

王銘銘

- 2008a 由此及彼，由彼及此——人類學隨筆 [From Here to There, from There to Here -- Anthropological Essay]。北京：民族出版社 [Beijing: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 2008b 從「當地知識」到「世界思想」[From “Local Knowledge” to “World Thought”]。西北民族研究 [Journal of Northwestern Ethnic Studies] 4: 60-82。
- 2015 超社會體系：文明與中國 [The Super Social System: Civilization and China]。北京：三聯書店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2021 「家園」何以成為方法？[How the “Home” Becomes Methodology?]。開放時代 [Open Times] 1: 24-37。
- 2023 從文化翻譯看「母語」的地位問題 [The Status of the “Mother Tong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ranslation]。開放時代 [Open Times] 1: 44-53。

毛偉

- 2009 身份、參與、書寫——家鄉人類學研究的三個困惑 [Identity, Participation and Writing -- Three Confusions in Native Anthropologist Study]。雲南社會科學 [Social Sciences in Yunnan] 3: 79-83。

末成道男 Michio Suenari

- 1993 研究東亞的自身社會的人類學 [Anthropology of the Study of the Indigenous Societies of East Asia]。刊於[In] 東亞社會研究 [East Asian Society Studies]，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編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ed.]，頁48-64 [pp. 48-64]。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朱炳祥

- 2018 事·敘事·元敘事：「主體民族誌」敘事的本體論考察 [Fact, Narrative, and Meta-Narrative: An Ontological Study on the Narrative of Subjective Ethnography]。民族研究 [Ethno-National Studies] 2: 40-53。

林徐達

- 2011 論地方知識的所有權與研究職權：從詮釋人類學的觀點省思 Lahuy

的「論文返鄉口試」[On the Ownership and Authority of Local Knowledge: The Reflections of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on Lahuy's "Thesis Defense at Home"]。臺灣人類學刊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9: 147-185。

林開世

- 2016 什麼是「人類學的田野工作」？知識情境與倫理立場的反省 [What is "Anthropological" about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Reflections on Its Epistemology and Enthics]。考古人類學刊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84: 77-100。

林耀華

- 2008 金翼：中國家族制度的社會學研究 [The Golden Wing: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Familism]。莊孔韶、林宗成譯 [Zhuang, Kong-shao and Zong-cheng Lin, trans.]. 北京：三聯書店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桑山敬己 Kuwayama Takami

- 2019 學術世界體系與本土人類學：近現代日本經驗（ネイティブの人類學と民俗學 -- 知の世界システムと日本）[Native Anthropology and Folklore]。姜娜、麻國慶譯 [Jiang, Na and Guo-qing Ma, trans.]. 北京：商務印書館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郭佩宜、王宏仁主編

- 2006 田野的技藝：自我、研究與知識建構 [Field Craftsmanship: Self, Research, and Knowledge Construction]。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Taipei: Chu Liu Book Company]。

陳美華

- 1999 反思「參與觀察」在臺灣漢人宗教田野的運用：一個女性佛教研究者的觀點 [Rethinking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the Field of Han People's Religions in Taiwan: A Feminist Buddhist Researcher's Point of View]。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88: 335-367。

陳雲龍

- 2021 儒家角色情感倫理與浙北鄉村人情生活的實踐與嬗變 [Confucian Role Emotional Ethics and the Practice and Transmutation of *Renqing* Life in Contemporary Rural Area of Northern Zhejiang]。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學位論文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 2023 從「承中有變」到「變中有承」：通過婚禮實踐看儒家倫理的地方化運行 [From "Changes in Inheritance" to "Inheritance in Change": Studying the Local Operation of Confucian Ethics through the Wedding

Practice]。社會發展研究 [Journal of Social Development] 3: 127-147。

許烺光 Hsu, Francis L. K.

- 2001 祖蔭下：中國鄉村的親屬、人格與社會流動 [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 Kinship, Personality and Social Mobility in Village China]。王芃、徐隆德譯 [Wang, Peng and De-long Yu, trans.]。臺北：南天書局 [Taipei: SMC Publishing]。

梁永佳

- 2019 超越社會科學的「中西二分」 [Transcending the "China-West" Dichotomy in Social Science]。開放時代 [Open Times] 6: 67-80。

張少強、古學斌

- 2006 跳出原居民人類學的陷阱：次原居民人類學的立場、提綱與實踐 [Escaping the Trap of Indigenous Anthropology: The Position and Practice of Sub-Indigenous Anthropology]。社會學研究 [Sociological Studies] 2: 107-133。

張峻

- 2010 從「他者」到我們——在家鄉人類學研究過程中的一些理論思考 [From "the Others" to Ourselves: Some Theoretical Reflects in Conducting Anthropological at Hometown]。民間文化論壇 [Folk Culture Forum] 1: 39-49。

項飆

- 2009 尋找一個新世界：中國近現代對「世界」的理解及其變化 [Searching for a New World: Changes in the Notion of "World" (*shijie*) in Modern China]。開放時代 [Open Times] 9: 103-114。

黃宗智

- 2005 近現代中國和中國研究中的文化雙重性 [Biculturalism in Modern China and in Chinese Studies]。開放時代 [Open Times] 4: 43-62。

傲東白力格

- 2006 地方性知識與主體人類學 [Local Knowledge and Subject Anthropology]。蘭州：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 [Lanzhou: Gansu People's Art Publishing House]。

費孝通

- 2004 論人類學與文化自覺 [On Anthropology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北京：華夏出版社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 2007 江村經濟 [Peasant Life in China]。劉豪興編 [Liu, Hao-xing, ed.]。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楊懋春

- 2001 一個中國村莊：山東台頭 [A Chinese Village: Taitou, Shantung Province]。張雄等譯 [Zhang, Xiong et al., trans.]。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社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趙旭東

- 2003 反思本土文化建構 [Reflecting on Native Culture Construction]。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翟學偉

- 2011 中國人的關係原理：時空秩序、生活欲念及其流變 [The Principles of Chinese Guanxi: Time-Space Order, Life Desire and Their Changes]。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潘年英

- 2001 本土人類學：重新發現的知識 [The Native Anthropology: The Knowledge of Finding Anew]。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 53-54+60。

潘英海

- 1997 文化識盲與文化糾結：本土田野工作者的「文化」問題 [Culture Illiteracy and Culture Blind: Indigenous Fieldworker's "Culture" Problem]。本土心理學研究[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8: 37-71。

潘峰

- 2007 本土人類學者的自我角色——溯源、批評、再定位 [History, Critique and Relocation of the Role That Native Anthropologists Play]。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7(6): 28-32。

韓敏

- 2011 一個家鄉人類學者的實踐與思考 [Practice and Thinking of a Home Anthropologist]。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33(2): 55-61。

Boyer, Dominic, and George E. Marcus, eds.

- 2020 Collaborative Anthropology Today: A Collection of Exceptions.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havez, Christina

- 2008 Conceptualizing from the Inside: Advantages, Complications, and Demands on Insider Positionality. *The Qualitative Report* 13(3): 474-494.

Chen, Yun-long

- 2023 Love and Gender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ism: Based on Fieldwork in Contemporary Rural North Zhejiang. *Rural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 20: 125-168.

Clifford, James

- 1997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013 *Returns: Becoming Indigenou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ollins, Peter, and Anselma Gallinat, eds.
- 2010 *The Ethnographic Self as Resource: Writing Memory and Experience into Ethnography*. New York & Oxford: Berghahn Books.
- Cui, Ke
- 2015 The Insider-Outsider Role of a Chinese Researcher Doing Fieldwork in China: The Implications of Cultural Context. *Qualitative Social Work* 14(3): 356-369.
- Denzin, Norman K. and Yvonna S. Lincoln, eds.
- 2017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5th Edition).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 Dyck, Noel
- 2000 Home Field Advantage? Exploring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s Sports. *In Constructing the Field: Ethnographic Fieldwork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Vered Amit, ed. Pp. 32-53.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Fassin, Didier and Alban Bensa, eds.
- 2008 *Les Politiques de l'enquête. Epreuves ethnographiques*. Paris: La Decouverte.
- Ferguson, Jane M.
- 2018 Nativity Seen in the Anthropocene: Contemporary Fieldwork and Subjective Challenges. *Th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9(3): 189-196.
- Greenhouse, Carol J.
- 1985 Anthropology at Home: Whose Home? *Human Organization* 44(3): 261-264.
- Haniff, Nesha Z.
- 1985 Toward a Native Anthropology: Methodological Notes on a Study of Successful Caribbean Women by an Insider.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Quarterly* 10(4): 107-113.
- Harrison, Faye V., ed.
- 2010 *Decolonizing Anthropology: Moving Further toward an Anthropology for Liberation* (3rd edition). Arlington: Association of Black Anthropologists.
- He, Xin
- 2021 *Guanxi and Law and Society: Fieldwork in China*. Hong Kong Law

- Journal 51(2): 625-644.
- Heimer, Maria and Stig Thøgersen, eds.
2006 Doing Fieldwork in China. Copenhagen: NIAS Press.
- Hockey, John
1993 Research Methods: Researching Peers and Familiar Settings. *Research Papers in Education* 8(2): 199-225.
- Hume, Lynne and Jane Mulcock, eds.
2004 Anthropologists in the Field: Cases i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Jahan, Ishrat
2014 Revisiting "Nativity" Doing "Anthropology at Home" in Rural Bangladesh. *Anthropology* 2(3): 1-8.
- Kanaaneh, Moslih
1997 The Anthropologicality of Indigenous Anthropology.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22: 1-21.
- Kim, Choong S.
1990 The Role of the Non-Western Anthropologist Reconsidered: Illusion versus Reality. *Current Anthropology* 31(2): 196-201.
- Kjellgren, Björn
2003 Then Predicament of Indigenisation Constructions and Method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Otherness in Chinese Ethnography.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1): 147-178.
- Kuper, Adam
1994 Culture, Identity and the Project of a Cosmopolitan Anthropology. *Man* 29(3): 537-554.
- Leach, Edmund R.
1982 Social Anthropology. Glasgow: Fontana Paperbacks.
- Lu, Hang-yan and Warren A. Hodge
2019 Toward Multi-Dimensional and Developmental Notion of Researcher Positionality. *Qualitative Research Journal* 19(3): 225-235.
- Motzafi-Haller, Pnina
1997 Writing Birthright: On Native Anthropologists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Auto/Ethnography: Rewriting the Self and the Social*. Reed-Danahay, D., ed. Pp. 195-222. Oxford & New York: Berg.
- Narayan, Kirin
1993 How Native Is the "Native" Anthropologist?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5(3): 671-686.
- Ntarangwi, Mwenda, David Mills and Mustafa Babiker, eds.

- 2006 *African Anthropologies: History, Critique, and Practice*. London & New York: Zed Books.
- Ohnuki-Tierney, Emiko
1984 "Native" Anthropologists. *American Ethnologist* 11(3): 584-586.
- Okely, Judith
1996 *Own or Other Cultur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Ribeiro, Gustavo L. and Arturo Escobar, eds.
2006 *World Anthropologies: Disciplinary Transformations within Systems of Powe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Rosaldo, Renato
1989 *Culture and Truth: 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 Boston: Beacon Press.
- Sangren, Steven
2007 Anthropology of Anthropology? Further Reflections on Reflexivity. *Anthropology Today* 23(4): 13-16.
- Sherif, Bahira
2001 The Ambiguity of Boundaries in the Fieldwork Experience: Establishing Rapport and Negotiating Insider/Outsider Status. *Qualitative Inquiry* 7(4): 436-447.
- Simmel, Georg
1971 The Stranger. In *Geor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N. Levine, Donald, ed. Pp. 143-149.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in, Harng Luh and Yang Yang
2020 When in China, Drink as the Chinese Do: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of Alcohol Consumption in Research and Fieldwork.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1(7): 1029-1036.
- Smith, Linda T.
2021 *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 Research and Indigenous Peoples* 2nd edition. London & New York: Zed Books.
- Tenzin, Jinba 丹增金巴
2022a Rethinking the Rise of China: A Postcolonial Critique of China and a Chinese Critique of the Postcolonial.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35(1): 83-106.
2022b Seeing Like a Native Anthropologist: A Post-Postcolonial Reflection on the Native Turn in Asian Academia.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Accepted Article).
- Tomlinson, John
1999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oloder, Lejla

2008 Autoethnographic Challenges: Confronting Self, Field and Home.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Anthrppology* 19(1): 27-40.

Xiang, Biao and Qi Wu

2022 *Self as Method: Thinking through China and the World*. Ownby, David, trans.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Zhao, Ya-wei

2017 Doing Fieldwork the Chinese Way: A Returning Researcher's Insider/ Outsider Status in Her Home Town. *Area* 49(2): 185-191.

陳雲龍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210004 中國大陸江蘇省南京市秦淮區建鄴路168號6221室

18260056293@163.com

“Home” as “Field”:

Rethinking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Indigenous Field Research

Yun-long Chen

Institute of Sociology

Jiangsu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Returning home” became a distinct turn within anthrop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studies in the 1970s-1980s, and the methodological disputes between “home” and “foreign” studies have lasted till today. Taking “foreign” study as a contrast,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s of “home” study, and then takes China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sort out this academic history and its core ideas. When criticizes the limitations and deficiencies of “foreign” study, and claims their own close-range advantages in entrance, language, culture, role, identity, relationships, communication, understanding, criticism, resistance, etc., the home or native scholars should not abstract and simplify problems within it and become self-indulgent. Or they may be exempt themselves from reflection and unable to transcend their own limitations.

In order to concretize the issues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researcher’s (close) cultural background on their field research, the author combines the fieldwork experience in his hometown of contemporary rural northern Zhejiang, to situationally position and empirically reflect on their multi-role identity, mutual relation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action process between researchers and the locals, as well as the emotions, trust, power, interests and ethical issues behind them. Furtherly,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home scholar’s position and identity in native society and the larger academic-cultural fields, and their complex influence on home or native studies, and then attempts to rethink the advantages as well as the limitations of home study and how to overcome them.

According to this research, “home” study may not have as many advantages as its academic group claims, nor does it have as many inherent limitations as some foreign scholars have criticized. Due to different cultural distance from the locals, the two sets of scholars have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ed fieldwork methodology issues, each having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e common goals of home and foreign scholars are vigilance against authority, resistance to solidification, opening communication, understanding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respecting for differences, maintaining diversity, seeking consensus and promoting harmony. The cor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s the high integration of the home scholar's research and life, and various practical problems caused, amplified and complicated by it.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particularity, the home scholar should fully consider the double influences (benefit or damage) of role, *guanxi*, trust, *renqing*, *mianzi*, identity, status, power and ethics of the local Chinese or Han people's society on their field work and daily life. If handled properly, the home scholars can consolidate their life circle while gaining academic achievements. If handled carelessly, it will cause more over-sheltering and damage in the academic and life fields.

Extending this to the academic-cultural field in mainland China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global academic-cultural system, if the home scholars overemphasize their proximity advantages and native methodology standpoint, and belittle or reject the foreign scholars' studies, they are likely to reinforce the systematic and essential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en leading to the academic-political problems of (*han*) nationalism, (socialist) ideology, and self-colonization, going against the fundamental intentions of field work, ethnographic writing, and academic communication, and becoming only the intellectual tools and academic rhetoric used to achieve academic fame and personal wealth, and consolidating the private circles in the home or indigenous academic field.

In conclusion, the methodological thinking of home, native, or indigenous studies fundamentally points to a more radical path of anthrop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understanding, reflec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self" and "us". This methodological stance particularly applies to the home or indigenous research areas in mainland China. Due to the academic and cultural shackles from within and without China are extraordinarily complex, the home scholars need more courage and perseverance to carry out self-reflection and breakthrough.

Keywords: Home, native or indigenous study, Field work, Cultural distance, Cultural identity, Self-reflection
